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2023 年第二季度成果简报

一、科研成果（发表论文 15 篇、时政论文 4 篇）

徐俊忠：《“人民民主”：何以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新形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专题“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有鉴于此，深入理解、领会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质、丰富内涵、战略旨趣、发展前景等，是通达民意、凝聚民心、汇集民智，推动国家向着新的百年奋斗目标积极、稳健迈进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学界处于民族全面复兴时刻，对历史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与担当。以专业和学术的方式，深入阐释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本刊力倡和践行的方向。本期约请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发表见解，即是这一努力的尝试，以期共同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学习好、研究好、领悟好，并努力促使其成为亿万人民伟大实践的自觉追求。

吴重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第 3 期。

【简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特征，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体现。

麦蕴妍、吴重庆：《被遗弃的神明：家庭信仰空间中的人神关系——基于广东东莞厦岗村的田野调查》，《民俗研究》2023 年第 3 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珠江三角洲民间宗教地理空间分布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3JJD720020）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在家庭神像崇拜流行的华南村落，有不少家庭神像被遗弃出家门、置于社坛及村庙边，呈现出特殊情况下人对神明的另类“处理”方式。以广东厦岗村为例，信众基于自身“自然”体验选择“请神”入户供奉，神明被“请”入家庭成为“长居客人”，与家庭建立亲密关系，但当神像与外部环境不和谐或家庭日常供奉秩序紊乱时，信众避讳谈论神明是否灵验，转而以感觉“不够自然”为由“送神”出户。“自然”与“不够自然”，是信众在家 庭信仰空间中对“请神”与“送神”行为的普遍性解释，体现出人们在处理人神关系时的谨慎态度。

肖汉臻、吴重庆：《小农户自发农业去过密化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

【摘要】：为探究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如何自发应对，基于云南省凤庆县马庄村实际案例，以小农户的劳动过程为研究视角，归纳了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特点，小农户据此制定的作物搭配策略、生产节奏配置和劳动力投入方案，以及小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研究发现，劳动力要素在小农户各项禀赋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快速增长的城镇化和非农就业”是促成中国农业生产进入“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关键变迁事件。在此背景下，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自发应对，集中表现为其在农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动。

户晓坤：《世界体系与现代化替代方案：萨米尔·阿明与俄罗斯左翼学者的对话》，《世界哲学》2023 年第 2 期

【摘要】：2018 年 8 月 12 日，左翼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萨米尔·阿明去世，成为俄罗斯学界的重要事件。阿明长期关注俄罗斯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现代化道路，与布兹加林等学者通过左翼论坛凝聚社会力量，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展开积极对话，探讨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条件以及世界体系结构变动的潜在趋势。本文旨在呈现阿明近年来在俄语世界中的思想活动与积极影响，阐明阿明以生产方式为主导概念研究边缘资本主义形态的历史形式与具体类型、基于中心-（半）边缘的能动结构探索新兴国家现代

化替代方案的方法论意义。

[德]米夏埃尔·宽特/著，王兴赛、李靖新弘/译：《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现代哲学》2023 年第 2 期

【摘要】: 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在形而上学上要求很高的历史哲学，“对象性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是其历史哲学总构想的核心资源。在 1843-1845 年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哲学，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想辩护。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尚未完全把经验的-偶然的因素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马克思试图在批判的社会哲学形式中确定因果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的类本质得以在经济过程中经验地实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分析彰显了他的历史哲学构想。马克思断然反对“概念的-哲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简单同一。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生史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凌菲霞：“The Hedgehog, Fox, and Quasi-hedgehog Approaches in Isaiah Berlin’s, David McLellan’s, and G.Stedman Jones’ Marx Research” ,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Vol. 10, Iss. 1, April 2023.（A&HCI，SSCI-Q2 收录）

凌菲霞：“The importanc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early Engels–a comparison between Engels’ and Marx’s research o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ic literature before their collaboration”，*New Political Economy*, 2023.

【简介】: *New Political Economy*（SSCI-Q1 收录）是英国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的英文学术期刊，2022 年在 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Economics 等 JCR 学科类别上均处于 Q1 分区。

徐长福：《中国的全球方位与现代化实践——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地理观的一个探讨》，《求是学刊》2023 年第 3 期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勾勒了全球现代化格局的四个“从属于”，包括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其间，中国被置于从属的一方。这可以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东方从属于西方”是其基本架构。在后来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美国从东向西对太平洋西岸即亚洲东部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俄国从欧洲到亚洲的扩张，包括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还注意到了作为亚洲近邻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这些情况都很难纳入他们的“东-西”架构。为了更加确切地厘定中国的全球方位，有必要将上述架构升级改造为立足于中国的“东（南）-西（北）-中”架构，它以“东-西-中”向度为主，兼顾“南-北-中”向度，东（南）指从海路而来的欧、美、日等国，西（北）主要指从陆路而来的俄国，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全球处境。

陈长安：《用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增强大思政课的吸引力》，《社会主义论坛》2023 年第 6 期

【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时，深情瞩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以下简称“历史考证版”）。2021 年 6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时，感叹中国新藏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以下简称“马恩原稿”）“很珍贵”。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官网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库公布、上传了包含了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马恩原稿的电子图片，可供全球任何联网的读者浏览、下载。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中山大学等中国机构和民间人士也收藏、发表了部分马恩原稿。怎样充分关注和有效利用这些珍贵的马恩原稿，增强大思政课的吸引力，努力实现“三全育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面育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黄欢：《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现代哲学》

2023 年第 2 期

【摘要】：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注】：作者为本所博士生

高谦：《“公私兼顾”——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建构》，《现代哲学》2023 年第 3 期

【摘要】：作为一名政治家，毛泽东没有将公与私视为孤立的道德命题。从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公私兼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公私兼顾”的话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公私双方“兼顾合作”发展生产的经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再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源于经济生活的公私“相兼顾”突破了“相对立”的传统认知，这不仅表达出毛泽东对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思考，也为实现公私兼融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思想契机和行动指向。

【注】：作者为本所博士生

[美]罗伯特·哈里曼/著：《何谓人类世的明智？》，覃万历/译，刘宇/校，《现代哲学》2023 年第 3 期

【摘要】：本文试图表明通过调整明智（phronêsis, prudence, practical reasoning, or practical wisdom）这一独特政治判断模式可以应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明智是对偶然事态进行推理以选择最佳行动方案的模式。它使规范性、计算性和表演性技巧协同动作，反映的是政治行动的多元性、偶然性和实践性状况。然而，明智的

惯常用法偏向于小型问题、长期进程以及政治上适度，也就是说，它无法解决大规模和紧迫性问题。为使明智可以应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全球变暖问题，必须对它进行调整。调整包括评估并融合与解决问题密切相关的诸知识形式——活跃在公共话语中的政治、技术、伦理和艺术的思维方式，同时应用并扩展明智判断的典型特征——重申富足，改变繁荣的标准，并把美视为交往和共同体的一种资源。

徐俊忠：《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的重要标识》，《经济导刊》2023 年第 6 期。

【摘要】：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重要形式，也是巩固党的理论建设成果的基本方式，更是党的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这里，“人民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张笑夷：《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的当代建构及其意义?——基于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 年第 2 期

【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和复杂现实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重要理论任务与重大课题。列斐伏尔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中重新发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概念，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进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话语在观念中再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既是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把握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存续和变化而言， 我们始终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 资本主义更新生产关系的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存续和变化这个谜题需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阐明，我们今天的理论任务是， 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重构性地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

时政论文（4 篇）

吴重庆：《城乡流动复苏，正激发县域社会活力》，《新京报》2023 年 5 月 4 日 A12、A13 版。

吴重庆：《农村还是费孝通先生说的那个“熟人社会”吗？》，《观察者网》2023 年 5 月 5 日。

吴重庆：《为什么龙头企业不愿直接雇用农业工人？》，《观察者网》2023 年 5 月 12 日。

户晓坤：《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6 月 29 日第 005 版。

二、科研成果转载情况

徐俊忠：《关于“人民政治”的概念》，原载于《开放时代》2023 年第 1 期“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资助知识体系（笔谈）”专题，被《新华文摘》2023 年 7 期“论点摘编”转载，转载题目是“‘人民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

李萍、王泽宇：《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原载于《道德与文明》2022 年第 6 期，被《新华文摘》网刊 2023 年第 12 期转载。

三、主办系列讲座

1、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第 3 讲

2023 年 4 月 7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第 3 讲顺利在线上举办。讲座主题为“如何在唯物史观中行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情势政治学”，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祁涛担任主讲人，马哲所暨哲学系助理教授张米兰担任主持人。

讲座伊始，祁涛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的文本特殊性理解切入，题解了讲座主题，并讲述了阅读方式。他指出，该文本没有直接给出清晰的理论框架和结论式的理论教诲，而是着力于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再现，这实质呈现了唯物史观从微观来认识宏观问题的另一视角。《雾月十八日》的文本本身是对 1848-1852 年政治的直接性的介入，而它实际也要求读者作为行动者而非旁观者进入到文本阅读。同时，《雾月十八日》是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对法国情况的具体分析和反思，我们有必要在 1848-1852 年文本群中研读它。进而，祁涛给出了两种“打开方式”，其一是找到核心主题“一段倒退的历史是如何可能”，即“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其二是确定阶级、国家和历史三个相互关联的模块，探讨复杂、动态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及其历史基础。

接下来，祁涛探讨了历史的悲喜剧问题。针对历史的反复，黑格尔指出第一次出现具有必然的悲剧色彩，马克思则认为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848 革命中的小拿破仑所面对历史情形完全迥异于 19 世纪末的老拿破仑，即使他完全复刻老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他也只会显得不合时宜而沦为笑剧。同时，法国大革命和 1848 革命两次革命的对比也呈现了历史的悲喜剧。在法国大革命中，呈现出资产阶级为捍卫革命原则纯洁性而不断流血革命的“上升的路线”，也即悲剧路线；在 1848 革命中，则呈现出革命力量内部不断分化、革命性不断减弱趋于保守的“下降的路线”，也即喜剧路线。通过引入福柯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祁涛指出，《雾月十八日》启示我们，唯物史观不仅要明确自身的正确认识和革命行动，还要洞悉在实际历史中形形色色不合时宜的幻想、迷信与行动，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根据。

由此，祁涛区分了“结构的历史”与“情势的历史”两个层面。借助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分析，祁涛指出唯物史观“结构的历史”是指较长时段积累、强弱不均的多层次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但正如阿尔都塞的多元矛盾论所指出的，社会结构不是固定、唯一的实体，其内部存在不均衡性。阿尔都塞指出，结构的矛盾只是确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的形势，但它不能直接创造“革命的形势”，更不能促成革命爆发的形势和革命的胜利，它所促成的只是具有各种可能性的“情势”。这就涉及到“情势的历史”。“情势”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历史的结构促成情势的出现，而政治实践正是针对特

殊的情势的介入，情势由此会促成深层次的结构的历史改变。政治实践的能动作用与历史结构的发展速率息息相关，把握还是违逆历史结构发展方向，会导致加速或减缓历史结构发展速度。从情势的历史分析，《雾月十八日》呈现了当时法国的具体情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分裂的社会不足以提供进一步革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占多数的小农期望强力的政权解决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存在向保守倒退的可能。波拿巴的上台正是把握了当时的情势，其后果是现代革命进程倒退。1848 革命失败，社会似乎退到其出发点之前的社会基础，若想革命成功，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必需的出发点，把握结构的历史及其生成的情势，同时要积极地介入情势，创造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the conjunction,the relations,the conditions)。这涉及到 19 世纪社会革命与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异，不同于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对过去历史事件的重复与追忆，19 世纪社会革命更需要在唯物史观中清晰理解其所处的情势，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中来把握行动。

最后，祁涛借助毛泽东的 《矛盾论》，概括了《雾月十八日》“如何在唯物史观中行动”启示，强调一方面要理解结构的历史在深层意义上的决定和支配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把握情势的历史，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等情势的变更本身可能转为决定性的作用。对情势重要性的强调，也是唯物史观反教条主义的重要启示。

报告结束后，线上听众就“历史的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历史的重复与差异”、“历史的创造如何发生”以及“历史的情势的理解”等方面进行提问，主讲人对其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解答。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圆满结束，共三百余名观众参与。

2、实践哲学讲堂第 33 期

2023 年 4 月 10 日下午，第 33 期实践哲学讲堂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515 会议室举办。本期讲堂由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主讲，主题为“何谓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又有何种根本责任？”。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堂的主持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俊志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评论人。

本期讲堂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现代化研究所主办，共有 70 余位师生参加。

在报告开始前，徐长福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实践哲学讲堂系列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隆重介绍了本次讲堂的主讲人和评论人。

黄裕生在报告中指出，“现代国家”不是一个历史学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政治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这里所谓的“现代”与“古代”并非只是历史学上的区分，而是社会本身的区分。基于此，他对目前关于现代国家的流行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批评。第一，流行的意见将现代国家等同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从民族国产生的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实力。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基于“实力即正当的原则”。第二种观点认为秦制国家就已经是现代国家。所谓秦制国家，亦即以法家确立的“尊君-上法”原则为最高原则构造的国家。这种秦制国家的每个层级的权力都传递着其最高层级权力的特性也即权力的无边界性。秦制国家的立国原则与民族国家的立国原则一样都属于古代原则。第三种意见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当作现代政治理论学说的开端，其理由是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将政治世俗化，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政治问题。但，实质上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不过是欧洲版的法家。

在分析了上述三种观点后，黄裕生通过讨论国家的起源、立国原则与目的出发为讨论何为现代国家这一问题确立分析坐标。他提出，从对国家本质的理解可以抽象出一个普遍的标准，即一种有强力作为保障而被接受为能更好处理其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的第三方治理机构，而产生这种第三方并保障这一第三方的正当性的合理方式就是契约。在这个意义上，契约被视为国家的“现代性”与“正当性”的来源。黄裕生认为，在通过契约产生国家之前，人们必定已然存在于一种自主的相互性关系之中，他把这种自主的相互性关系称为最原初的伦理社会。而人类之所以被卷入一系列自主的相互性关系，乃在于人类被赋予了自由理性而被自由理性所居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实际上是以自由理性展开出来的伦理社会为基础而契约出来的是一种升级版的第三方，它承载了人民的信任、期待与承诺，因此也对人民负有责任，即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的安全以及不可让渡的一切，包括生命与自由等等，并保证共同体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黄裕生强调，国家的产生只能是出于人们之间的契约。但与传统契约论不同，这种国家的正当性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特殊意志，而是来自人民的普遍意志。作为缔造国家的契约者，人民是所有把自己的意志上升到普遍意志，并根据普遍意

志统一、约束自己的私人意志的全体契约者。

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了评论环节。

评论人何俊志就三个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第一，契约论被视为构建现代国家正当性的唯一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功利主义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基础和解释效力。第二，如果不存在自然状态，伦理社会如何可能？没有国家之前的伦理社会如何可能？这些是值得怀疑的。第三，根据马克思对国家作为一种阶级统治工具的批判，国家意味着强制和不自由，现代国家理论如何回应这种观点？

评论人马天俊从三个方面对报告做了评议。第一，报告中国家起源问题是通过类比几何学起源问题来阐明的。类比，力度有限，有时也可疑，更优的一般说来是直观，尽管直观也不无可疑性，但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会不会有这类直观？第二，参照洛克和马克思的先例，“共同体”（community）难免有滑向有机体-利维坦的隐患，“联合体”（association）似乎更合适些。第三，探讨国家问题，既要观察说，更要观察做，评估经典而辅以适当历史（如兵制、役制、税制），必会更加有力。

黄裕生对上述评论作了简要回应。第一，功利主义国家观跟契约论国家观并不一定矛盾。第二，人类一旦进入社会状态就是进入了伦理社会。第三，马克思所谓的现代国家是指进行现代生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同于本报告所讨论的那种真正的现代国家，其目标是扬弃资本关系，进入真正自由和平等的联合关系。第四，国家作为利维坦而存在的确是危险的，因此需要强调的正是权力的边界与制约。第五，关于几何学类比的分析以及“联合体”这一用语的建议十分重要。第六，吸收更多的历史学知识以更为全面地进行考察的确是有必要的，不能仅停留于对秦制消极意义的批判，而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积极意义。

在讨论环节，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提出，关于国家原则或纯粹国家的探讨的相关疑惑在于，有无一个衡量的标准（刻度），一个共同体达到这个标准就需要订立契约，成立国家，而超过这个标准就需要成立一个超国家的组织？质言之，如果完全不考虑民族历史与文化等具体因素，为何不直接订立一个超国家的组织？

黄裕生回应道，国家成立的最小标准不是空间（地理）上的自我设界，而是在文化上达到相对的独立性和统一性，一群人联合在一起，扩展成一个自我认同、

自我治理的文化空间，这是国家产生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国家的最大限度或许不是国家的联合体，而是全人类的联合，即只存在一个人类共同的文明国家，它需要一种得到最普遍认同的普遍性文化。

徐长福提出，德语的“Volk”一词可表示人民和民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英译也使用了“nation”和“people”两个词，可见，人民和民族两个语词的复杂勾连需要加以澄清。

黄裕生回应指出，德文中表示“民族”的单词原是“Nation”，后来才改用“Volk”一词。另外，孙中山是基于 nation-state 来理解国家的，他所谓的“中华民国”把 nation/people/state 三个概念等同起来了，当民族包含着着整个国家共同体的所有人时，民族往往也就被等同于人民。

此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何光顺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代文勃硕士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叶甲斌博士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卢俊豪博士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等人也就报告相关内容进行提问或讨论。黄裕生作了逐一回应。

在会议的最后，徐长福向黄裕生赠送纪念海报，并与何俊志、马天俊合影留念。

3、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65 期

2023 年 4 月 17 日下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504 会议室举办了第 65 期“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本次研习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 100 余位师生参加。

本次研习会由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旺副教授主讲，主题为“论作为法权现象的商品与劳动力价值——兼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意志与承认问题”。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暨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成员马万东担任本次研习会的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教授户晓坤、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良斌担任评论人。

在报告开始前，主持人马万东向与会师生表示欢迎，介绍了本次研习会的主讲人和评论人。

黄旺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着诸如“意志”“承认”这样的法权概念作为隐蔽前提，这意味着只有从法权现象和法哲学原理的角度去

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经济现象理解为法权现象，才能令人信服地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劳动力价值概念的背后的法权、意志与承认等法权现象决定了一种自然力能否最终凝结为商品的价值，并且也能够回答为什么纯粹的自然力能够无偿地被人类占有。其次，法权现象的理解方式是通过回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研究进路而得出的结论，因为马克思的研究正是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出发，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然后逐步地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此代替了最初设想的市民社会批判。最后，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论题概念与操作性概念区分开来，可以进行一种症候式的解读。思想家对于论题概念有着充分的理论和方法自觉，然而，对于那些为了解决问题所借助的操作性概念，思想家则往往是在无意识、不自觉的状态下使用它们。法权、意志和承认的概念正是这样的操作性概念，这说明了任何一个思想家在方法论中都不可能彻底地反思所有东西，同时这也意味着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中看到他看不到的问题。

在引出法权现象的视角后，黄旺开始分析作为法权概念或法权现象的商品与价值。首先，对商品的理解要穿透两重幻象，第一重是商品之间的关系网络，第二重是商品背后的人的关系网络。其次是以自由意志的角度理解一般自然力和作为法权的自然力。这涉及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理论路线，即意志的双重规定与法权的双重论证。再次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法权斗争，以及为什么资本家可以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最后是意志颠倒与拜物教的问题，以及对宽特观点的考察。宽特认为，我们要从法权，从承认的现象去理解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并且需要在马克思那里补充一个伦理学的环境，但黄旺认为，法权斗争和承认理论本质上不是伦理学的概念，而是唯物论的概念，仍然是经济现象。

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了评论环节。

户晓坤指出，黄旺在报告中将商品与劳动力价值作为法权现象来讨论，从而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隐匿的意志与承认问题揭示出来，并且衔接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出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这一更早期的问题意识中，这样独特的出发点、研究视角，以及区分议题概念和操作概念的方法论，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路径，让人觉得受益匪浅。尤其是对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般性把握是从古典经济学的背景切入的，特别是当马克思说，转向物质利益的领域之后，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就成为在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马克思所依傍

的理论背景和分析范式。

户晓坤提出两个可进一步阐释的问题。其一，对于马克思而言，法权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问题意识、概念工具、研究范式等方面都已经有了新的开端，如何在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中进一步将两个方面统摄起来，是否需要更为充分的论证？其二，如何看待法权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

陈良斌指出，黄旺的报告有四个特点：首先是新颖，无论是主题还是观点都是非常耳目一新引人入胜的，尤其是论证思路突破常规；其次是缜密，论证层层递进，推演非常严密；第三是透彻，对商品、劳动力价值等概念做出了非常充分且具有说服力的论证；第四是深邃，涉及到非常深层次的问题。但以黑格尔法哲学的论证来代替马克思的论证似乎预设了一个前提，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资本论手稿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思想立场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还需要补充马克思的一些论证，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论证链条的顺滑性。其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解放最后是消除阶级的，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斗争最终走向阶级和解？能否将普遍均值的国家理解为使失衡的阶级关系重新平衡？普遍均值化的国家可能是尼采式的末人社会，这和自由人联合体是南辕北辙的。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法权批判最后都被统合到了力量维度的批判，力量维度能否作为黄老师整个论证架构当中的最后一种本质？

黄旺对上述评论逐一作了回应。针对户晓坤的问题，首先，在法权论证的思路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证的思路的关系问题上，虽然二者在比较基础的层面上存在共同点，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以抽象的、结构主义的网络关系来处理诸如商品、劳动力价值的概念，这构成了二者根本的差异。其次，阶级斗争和法权斗争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同一种斗争的表现形式，问题在于不同斗争方式的力量不同，某种斗争形式在最后取得了优势。针对陈良斌的问题，黄旺承认，由于法权概念在马克思后期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是否马克思前期和后期在法权问题上实际立场完全一致，还可以做进一步考察；其次，关于经济斗争走向阶级和解的问题，黄旺认为，阶级斗争最终目的就是实现阶级和解，而阶级的和解也意味着阶级的消失，但无阶级的社会不意味着无矛盾的末人社会，社会不可能是无矛盾的，缺乏矛盾与压力的社会必然死亡。

深圳技术大学邓盼老师、中山大学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兴赛副研究员、朱晨飞硕士生、代文勃硕士生以及线上学友就报告相关内容向

黄旺进行提问。主持人马万东、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就有关话题与黄旺作了进一步的交流。

讨论结束后，马万东向黄旺赠送讲座海报，并对黄旺、户晓坤和陈良斌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与会师生对本次研习会的关注和支持，最后宣布本次研习会圆满结束。

4、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 2 季第 1 讲

2023 年 4 月 18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二季第一讲在线上成功举办，国际著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者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教授主讲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解释原则和方法论问题”（The Engels-Marx Relationship: Interpretiv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cal Fallacies）。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志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与硕博连读生陈思静担任学术翻译，本次讲坛共有一百六十余名观众在线参与。

徐长福对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与讲座流程作了介绍。卡弗长期专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马恩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出版了 10 余种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论著、文集、工具书和译著。

卡弗指出，根据恩格斯的个人经历来描述和把握恩格斯与马克思关系，将是新颖且必要的研究进路。卡弗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阐述了其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时所遵循的数项原则，例如不预设需要证明的东西；仔细考虑写作时间、著作受众、作者动机、审查条件；谨记档案记录的不完整性；假定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保持学术好奇心等。他还列举了其研究所尽力避免的方法论谬误，例如认为传统就能够解决问题；认为差异是二元对立的；将新的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认为某个人的观点是决定性的并能解释一切；对任何一种记录下来的思想只采取一种可能的解读等。

卡弗表明，Engels Before Marx（2020）一书研究了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建立政治伙伴关系前的十年里的生平和著述。自始至终，读者在不知道叙事走向和结果

的情况下从恩格斯的视角看世界，这一方法论的确立，展现了青年恩格斯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期间独立取得的广泛且宏伟的成就。根据这一视角，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众所众知的马恩的第一次会面。对这次会面的描述出自恩格斯写于 1895 年的信件，恩格斯于 1842 年 10 月从柏林到科隆再到巴门，然后在 11 月从巴门到科隆再到曼彻斯特。在恩格斯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当时情况的资料中并没有提到马克思，而从当时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莱茵报》时期的主要事件是他与摩西·赫斯的会面。然而，赫斯在 19 世纪 90 年代没有被恩格斯所提及，因为赫斯及其思想对于恩格斯而言不再重要了。在 1895 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写信，内容正是关于马克思的，他希望人们相信，在《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非常重要。但是，历史资料告诉我们，马克思只是在默认的情况下接管了编辑工作，而恩格斯不仅比马克思更早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而且当时发表的文章数量是马克思的两倍多。

报告结束后，李志对卡弗的报告内容进行了评议，指出恩格斯在 1844 年之前已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有颇多成果，当时的马克思对于物质利益问题尚未表现出如此多的了解。如卡弗所说，把应该被论证的问题当作前提将导致方法论谬误。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第一小提琴手并将马克思推到台前，这可能是恩格斯的一种自谦做法，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二人的关系。卡弗的方法论原则启示我们采取更为开放和注重史实的研究方法来解释马恩之间的关系。

徐长福教授补充评论了两点。第一，卡弗的提示使我们关注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出版时的政策背景。彼时出版物仍受到普鲁士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所以马克思的措词也不是很直接。相比之下，新莱茵报时期，即 1848-1849 年，普鲁士在言论上可能更宽松一些，或许与当时局势动荡、政府无暇顾及有关。第二，应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专业经济学研究和最初掌握的一般经济学知识与经验，它们在思维范式上不同。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开始接触经济学的知识和实际问题，但他直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在用哲学思维方式处理经济问题，而完全以专业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研究经济问题还是在移居英国之后。恩格斯略有不同，他最初的经济学知识和体会是从经济实践中来的，后来顺势就进入了专门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 年）就表现出了很高的经济学专业水准。所以，不能笼统地说他们早就懂经济学了。

卡弗回应说，不管是在普鲁士还是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马克思1859年的著作也受到限制，哪怕这种限制相对1840年代已经有所放松。另外，在1840年代，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等人实际上都没有在大学获得教职，因为大学清除了像马克思这样具有革命精神的人，所以马克思并不是在学术刊物发表哲学文章的学者，他是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或其他时政问题的新闻工作者。

在评论结束后，讲坛进入讨论环节。中国人民大学谷民德博士生提问说，如何看待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领导地位（第一提琴手）的强调？卡弗回应说，领导地位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的。马克思在名声、著述和工人运动组织上具有领导地位，但是恩格斯在财力和经济实力上占有领导地位，两者是互补的。还有同学问及青年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情况。卡弗认为恩格斯在1842至1844年间用英语写的关于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很有价值，更有意思的是他用德语为德国读者所写的关于英国的文章（《伦敦来信》），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及其影响的阐述是在向德国读者展示德国未来的样子。恩格斯的《伍珀河谷来信》对当地小范围的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阶级斗争作了分析，而这些状况是他在英国也观察到的，他的政治研究议题本质上是关于现代性、资本主义与宪政以及这些话题下的革命。

在讲坛的最后，卡弗衷心感谢了主办方与参会人员。徐长福对本次讲坛进行总结，期待有机会邀请卡弗教授莅临中山大学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5、现代哲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1讲

2023年4月24日上午，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现代哲学杂志社基地、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一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103会议室开讲。本讲由《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李捷主讲，主题为“全面学习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俊忠教授担任主持人，共有来自校内外的100余位师生参加。

在报告开始前，徐俊忠教授作了开场致辞。他首先指出，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因此开设这个系列的讲座十分必要。本次讲座不仅对于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加强研究生人才培养和推动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随后，徐俊忠教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李捷教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

李捷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一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全面学习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要求，也是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任务，还是广大师生加强专业学习的重要方面。本次讲座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二是如何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三是如何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四是如何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李捷教授指出，研究清楚这一问题，需要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此前的工业化现代化起步的关系、新中国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性成就同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发展历程的关系。

关于如何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李捷教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担当等十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概括，并对其中的若干内容进行重点解读。

关于如何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李捷教授认为，西方国家走过的是先进行工业化、再拓展为现代化的历程，而中国的发展既体现为从工业化逐步向现代化拓展，更体现为在现代化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工业化的基础、牵引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现代化不断拓展升级、工业化也不断拓展升级的特点，避免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空心化”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广东考察时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既发挥工业化的基础和牵引作用、又注重现代化的全面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优势。

最后，李捷教授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他认为，需要把握好这一关系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层次解决的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从农业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失其根和魂并焕发出新时代的生命力与活力的问题。第二个层次，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这一层次解决的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或“资本逻辑陷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第三个层次，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这一层次解决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李捷教授强调，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替人家去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亦不是要对西方现代化和西方文明取而代之，中国秉持“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的文明观，但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全新选择。

报告结束后，徐俊忠教授进行评论。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是一个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的理论。李捷教授从多个维度通透地解读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这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远远地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我们要不断地探索与创造，不能只研究陈言而不研究事实。我们需要走进人民、走进社会、走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促进。

在讲座的最后，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党委书记王丽霞向李捷教授赠送纪念海报，并合影留念。

6、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第 4 讲

2023 年 4 月 26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第一期第四讲在线上顺利举办。讲座主题为“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探索与反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黄志军担任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特聘副研究员王兴赛担任主持人。

在讲座开始前，王兴赛向与会师友表示欢迎，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系列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其相关安排，并隆重介绍了本次讲座主讲人。

讲座伊始，黄志军以《共产党宣言》的选段为例，简要表述了对马克思“现代”观念的感受，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交往关系、观念等方面界定资产阶级时代与过去时代的差别，既有肯定方面，又有否定方面。黄志军还指出我们对“现代”的理解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使用“现代”一词，但也应该注意把握“现代”的基本面向。由此，黄志军展开本次讲座的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进步和鄙俗两方面阐述了马克思对“现代”的两种理解，具体讲述了社会形态的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格依赖阶段，其内容是物象的交往，因在狭隘的、孤立的地点发展，所以需要以“脸面”为中介的，需要看对方的“脸色”，即身份、地位等。第二阶段是依赖于物象的阶段，此阶段人格相对独立，与“脸面”无关。第三阶段是自由个性阶段，个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存在，无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是社会分工的角度看，个体都是共同体中的一员。现代社会是三大阶段中的第二个阶段，是以对物象的依赖为基础、以交换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目的、人格取得相对独立性的过渡性社会。进而，现代世界是一个颠倒的、全面异化的、鄙俗（vulgär）的及人间清醒的世界，即生产的目的和手段颠倒。人的内在本质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往的时代中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人的尊严、体面、道德都服务于财富的实现，每个人在贫富差距显著的世界都必须冷静的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第二部分阐述了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规律在于创造交换价值。现代化指从从前现代转变为现代的过程，表现为四种方式的现代化。第一种现代化是劳动方式的现代化，所有劳动转变为以创造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劳动，交换价值直接成为生产的对象，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第二种现代化是交换方式的现代化，所有交往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表现在私人交换产生世界贸易，私人独立性依赖世界市场，分散交换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体现了私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形式。第三种现代化是消费方式的现代化，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低成本、高效率与最大利润，非生产消费表现为资本总体上要求并刺激人们扩大享受范围、增加享

受数量，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第四种现代化是能力体系的现代化，表现为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劳动能力、生产机器和制造大工业的能力、普遍勤劳和科学训练及发现和掌控经济规律等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形成。

第三部分阐述了自由个性是马克思从劳动、交往、需要方面反思社会现代化的尺度，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表现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导致个人从属于存在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是对个性的否定，个体作为资本的生产要素而出现在劳动过程中，个人生产的结果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返回自身，但另一部分以剩余价值的形式由资本家占有。第二方面表现在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为物的能力，体现为交往的异化、形式上的平等及内容上自由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把自身当作商品来交换。第三方面表现在财富本身成为个人价值的一般尺度，在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分离的情况下造就了绝对贫穷，在流通中工人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己的消费并不能使工人致富。第四方面表现为自由个性在对物象的依赖阶段就地开始，“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第四部分阐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的相关思考。黄志军指出马克思探索的是整个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首要区别在于，中国现代化是成长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不是谋求霸主地位，而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中现代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不是分离的关系，要把握劳动者作为人民主体与资本的多向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物象性、伦理性与公益性。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关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现代化的政治基本取向、人类文明的先进要素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现代化。

7、实践哲学讲堂第 34 期

2023 年 4 月 27 日上午，第 34 期实践哲学讲堂在线上举办。本期讲堂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侯才教授主讲，主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堂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评论人。

本期讲堂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共有 260 余位师生参加。

在报告开始前，徐长福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实践哲学讲堂系列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隆重介绍了本次讲堂的主讲人和评论人。

侯才在报告中指出，一般而论，研究者面对的外译文均为次生形态的文本，而对原生形态文本的追溯是研读经典文献的必要前提和重要路径，《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文称《形态》）是一部作者生前未能发表的文稿，对其原生形态的追溯就显得更为重要。报告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含“费尔巴哈”章节在内的《形态》全书的文本性质。在 2004 年 MEGA2《形态》先行版发表后，陶伯特提出《形态》实际上是两卷本的季刊而非著作的观点。关于《形态》是文集或著作的争论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定位，也直接影响着文本的内在结构。马克思于 1846 年致卡·威·列斯凯的信中多次以“出版物”（Publikation）或“论战性著作”（polemische Schrift）的名称提及《形态》。另一个需要重视的证据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回忆录《摩尔和将军动荡生活的概述》，根据她的回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给予了马克思、恩格斯外部推动，使《形态》成为一部庞大的著作（ein voluminoeses Werk）。从文本分量、内在逻辑和论述方式来看，《形态》第一卷第三章即“圣麦克斯”章可以被视为独立的专著，伯恩斯坦也将该章文稿作为独立的著作予以发表。

第二，“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编序。自 1924 年“费尔巴哈章”问世以来，各种编辑版本提供了不同的文本编序方案。这些方案可分为沿用手稿既有编码和页码、以手稿内容的内在逻辑为原则、以年代学即写作时间为原则、手稿内容的内在逻辑与年代学相结合四种。应予确认，纸张编码 1 至 5 均为恩格斯所标记，并以此作为文本编序的根本原则。

第三，“费尔巴哈”章的文字判读。马克思、恩格斯手迹的识别是一大难题，目前仍存有改进的空间。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费尔巴哈”章作为首版德文版在手稿识读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阿多拉茨基通过纠正梁赞诺夫的文字错判推进了这一工作，利波尔版进一步纠正了失误，MEGA2《形态》正式版是迄今为止文字判读较为完善的版本，但仍有极少数判读值得商榷。鉴于各种版本存有歧异的判读逾百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字迹加以重新辨识、判读和进一步

审定。

第四，“费尔巴哈”章的文本汉译。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转换或思想传达是一种重构、复制和摹写，语词特别是重要概念的理解和翻译在经典文本的研读中具有重要意义。侯才以五对德语词为例讨论了“费尔巴哈”章汉译中的概念混淆问题。例如，Ideologie 一词按照德文原意应译为“观念体系”，郭沫若首先在其汉译本中采用“意识形态”一词，这是借用了日本学者在翻译 Bewußtseinsform（意识形式）时所创制的中文概念“意识形态”。

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了评论环节。赵玉兰指出，首先，对《形态》的文本性质的判定不是形式问题而是有着重要意义。MEGA2 第三部分第二卷的编者格洛维纳给出了能支持“季刊说”的许多资料，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魏德迈以及威斯特伐里亚两位企业主的书信，其中涉及的关键词就是季刊。报告提及的燕妮的回忆录是一个重要的材料，提示我们注意到《形态》的写作时间以及原始问题。如果据此把施蒂纳视作《形态》的写作起点，可以重新审视一些理论问题，例如，MEGA2 编者将鲍威尔视为写作起点，批判鲍威尔的部分已经包含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这与经由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形成唯物史观的观点不相容。其次，报告还提示了两点，一是应按照手稿的原始样态进行编辑，二是恩格斯的纸张编号可以作为“费尔巴哈”章的编辑基础。MEGA2 编者以及梁赞诺夫都不确定除大束手稿外的编号 1 至 5 的材料是否是由马恩亲笔编号的，这些编号的确切来源与判定需要更深入的论证。

马天俊在评论中指出，首先，阿多拉茨基版《形态》在 30 年代初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成型也在那个时期，经典文本解读及编辑与哲学理论体系之间，可能存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彼此循环。其次，作为马哲体系的经典资源，“费尔巴哈”章确实不同于《反杜林论》、《终结》等正式出版物，按现代出版惯例，几代编辑者似乎都默认要把该手稿加工成正式出版物，不过同样按现代出版惯例，该章如此棘手的手稿状态不像是交到出版社的那种待出版的手稿的样子，是不是也许有过更成熟的稿子，或者，如此原始的手稿其实不必非要加工到正式出版物的样子。最后，翻译也是解释，确实是关乎学理的，词源学往往显示着客观的观念史，这方面既然侯才老师做得已经如此深入，我们真是期待供学术研究用的侯版费尔巴哈章不久将能出版。

侯才对上述评论逐一作了回应。针对赵玉兰的评论，侯才指出，编码和编页

的考证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但仍需继续研究，因为这是文本编序的最主要的依据。一个人的阿拉伯数字的写法与数码编码的习惯一般而言是比较一贯的，而有些时候则可能是随意的。目前在高清手稿的辅助下可以对字迹做考证工作。针对马天俊的评论，侯才认为，第一，阿多拉茨基版的以逻辑为根据的编序与苏联当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构有何种关联、是否为体系建构提供文本学依据或文献学论证，这些是很有价值的问题；第二，现存的《形态》文本是否是马克思委托魏德迈带到出版社的所有文本即经过誊清的手稿，这的确是值得怀疑的，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徐长福对侯才、赵玉兰和马天俊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与会学友对本次讲座的关注和支持，宣布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8、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 2 季第 2 讲

2023 年 5 月 9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二季第二讲在线上成功举办，德国学者斯迈尔·拉佩奇（Smail Rapic，曾译作“拉佩克”）教授主讲了“恩格斯晚期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Die Theorie des zeitgenssischen Kapitalismusin Engels’ Spatwerk und ihre Bedeutung fur die Gegenwart）。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江璐副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与伍珀塔尔大学黄文韬硕士研究生担任学术翻译，近百名听众在线参与。

徐长福简要介绍了讲坛主讲人与讲座流程。伍珀塔尔大学的拉佩奇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实践哲学、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研究方面有独到见解，相关领域著述颇丰。

拉佩奇认为，恩格斯晚期以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主张的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非还原主义解读。首先，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国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是通过对暴力的垄断，遏制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然而，也同样通过制度和法律巩固了经济的不平等。其次，恩格斯和韦伯都认为，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及其通过高效行政管理而实现的合理化，是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条件。恩格斯和韦伯都看到，资产阶级国家具有不可

避免的民主化趋势。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特性，而韦伯则强调官僚制的权力等级阻碍着民主的发展。恩格斯的理论还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解释框架，即资本主义生产为维持其自身制度稳定性而出现的不可遏制的增长和扩张，构成了殖民扩张的主要动力。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通过引爆世界大战的方式转嫁国内社会矛盾，据此，恩格斯在一战爆发前 25 年就预言了战争的到来。

最后，拉佩奇指出，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极具当代意义。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资产阶级国家牺牲公共利益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家干预的依赖性。这一转折点契合了恩格斯的判断，不同之处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掌控核心在金融领域。北约组织从北大西洋防御联盟转变为全球性干预力量，表明西方正试图在军事上挽救丧失的殖民主义全球霸权。这种尝试注定失败，但却暗藏着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拉佩奇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阻止危机和实现持久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

报告结束后，马天俊做了三点评论。第一，拉佩奇的工作重新定位了恩格斯，将其放在马克思和韦伯之间，借助韦伯思想界定恩格斯晚期关于国家和法的思想的意义，极具学术借鉴意义。第二，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史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史，恩格斯对国家问题思考的变化并非原则立场的变化，而是因社会形势变化作出的策略调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这里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是结合实际社会运动形势，历史唯物主义从其“竞争相”转向了“教学相”。随着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恩格斯的确重新重视国家和法等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在西欧、北欧延续至今的民主传统往往都运作于诸国之主权界限范围内，它如何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拉佩奇在回应中首先补充了对韦伯思想的理解。他援引德国经济学家沃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观点指出，存在着关于韦伯的右派自由主义和左派自由主义两种解读方式。后者强调货币是市场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似。他强调，韦伯对于没收财产的重视，正表明他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其次，他强调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他的立场，但民主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已经实践过的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曾经是西欧国家试图克服资本主义但被放弃了的策略，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关键的临界点，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变革。

江璐评论认为，拉佩奇对国际政治和北约对中国敌对态度的批评分析是准确的，这种态度背后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要求。拉佩奇将恩格斯与韦伯联系起来，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她指出，韦伯的关注重点在于德国社会的现代化、合理化和官僚化，其分析的适用性主要局限在德国。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韦伯对官僚制度专家统治的批评、以及韦伯与恩格斯对国家职能的思考，江璐认为，良好政府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实现管理阶层与群众诉求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后，她向拉佩奇提问，当下西方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是否也应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传统？

拉佩奇重申了国家在行政管理与政治统治上的区别，并指出了韦伯理论的两方面缺陷。其一，韦伯认为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将占据主导，轻视了在西方社会至今仍占据重要位置的政治斗争。其二，韦伯没有一个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解释框架。针对江璐的提问，拉佩奇认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阶段联系紧密，但在 19 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殖民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走向衰落。

在问答环节，听众踊跃提问。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万强提问，如何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视角理解中国的崛起？拉佩奇指出，要从非还原主义的解读来理解中国的崛起，这也是恩格斯的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通达社会主义的必要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关键，一方面是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在 70 年代通胀危机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将产能转移到中国、越南等低收入国家，给后者带来崛起契机。

最后，徐长福对本次讲坛进行总结，并期待与伍珀塔尔大学、与拉佩奇教授之间的合作交流计划将如期开展。拉佩奇教授也向主办方与参会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9、现代哲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 2 讲

2023 年 5 月 13 日上午，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现代哲学杂志社基地、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二讲在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锡昌堂 103 室和腾讯会议线上线下同步开讲。本讲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研究员主讲，主题为“‘调查

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谭群玉教授担任主持人，共有来自校内外的350余位师生参加。

在报告开始前，谭群玉教授作了开场致辞。她指出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具有极端重要性。此次讲座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调查研究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随后，谭群玉教授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杨明伟研究员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

杨明伟研究员在报告中首先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它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得失成败，支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党依靠调查研究取得胜利，也依靠调查研究走向未来。同时，调查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需要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大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次讲座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二是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三是调查研究是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四是调查研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需。

关于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杨明伟研究员指出，中国共产党有着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是靠调查研究立足、靠调查研究吃饭的政党。调查研究这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由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带头做过多次专门的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亲自撰写的调查报告。杨明伟研究员对党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认为党形成了解剖麻雀式、短暂专题式、大型系统式以及具体个案式四种调查研究方法，并以生动的历史事例对上述方法进行了解读。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分别作了大量的专题性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调查研究的著名论断，并分别形成了一系列有关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撰写的调查报告，因而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复杂环境，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关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杨明伟研究员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勤于调查研究、长于多谋善断”的行事风格。他提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并引用了相关案例作具

体解读。他认为，进入新时代，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就是因为我们党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坚持从调查研究出发来谋全局、谋万世。

关于调查研究是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基础一环，杨明伟研究员认为，调查研究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四风”问题，特别是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基础环节。他特别指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将其作为纠正党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基础一环，并发出了第一份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而近日，党中央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也明确强调：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

最后，杨明伟研究员从党的思想路线出发，就调查研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之需作了详细阐释。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握历史规律，破解发展难题，创造新局面，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烈反对当时红军当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来搞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最早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创造新局面、推动创新发展的政党。他认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就要摸清楚实际情况和突出问题，既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又着眼于方方面面的其他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近期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求以强化理论学习来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来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当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来检验主题教育的成果。

报告结束后，谭群玉教授进行评论。她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杨明伟研究员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生动全面地阐明了关于调查研究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调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价值。在理论上，调查研究涉及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是我们深入实际、了解实际的重要方法，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上，调查研究对于深入

分析和准确判断党情国情世情，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两个大局”，继而因时因地制定和调整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10、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第 5 讲

2023 年 5 月 18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第五讲在线上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张梧主讲，讲座主题为“《资本论》中的‘两个视界’：资本与商品”。中山大学马哲所助理教授张米兰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教授户晓坤担任总结人。共三百余名观众参与。

会议开始，张米兰向与会师友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主讲人和讲座主题。随后，户晓坤对本系列讲座作出总结。户晓坤指出，筹划本系列讲座的目的在于，以时代性关切重新解读经典文本，以新的问题视域把握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论核心，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概念与线索脉络，五位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杰出青年学者以新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为我们拓展了与经典文本对话的想象力和可能性，提供了深刻理解和把握时代本质的思想路径，谨代表中山大学马哲所向五位主讲人表达深切的感激。

报告开始，张梧首先指出，同一个世界，却可以由不同的视界加以把握。例如，面对同一台机器，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角度出发，往往会将这一台机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而站在英国政治经济学角度，我们会把这个机器看成是一种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看成是资本家已经预先支付的成本。视有差别，但视角并非都可等量齐观，因为承认每一个视角完全平等会造成相对主义的困境。在张梧看来，视角有深浅高低之分，关键在于哪个视角能够更加揭示出社会现实的本质。阿尔都塞认为，作为认知结构的“问题式”使人们看到特定对象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的对象：“总问题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而作为被排除的东西，它是由总问题领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张梧借用阿尔都塞的“问题式”概念指出，作为认知结构的“视界”对于认识对象、认识结果乃至认识活动本身具有隐匿的制约性。

张梧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有两个视界：一个是商品的交换视界；另一个则是资本的生产视界。资本家站在商品交换的视界把握资本主义世界，而马克思则站在资本生产的视界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把握。故而，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可以在此意义上被理解为“视域的转换”，即从商品交换视界转向生产方式视界。接下来，第一个要阐明的问题是《资本论》中两个视界的关系问题。

张梧认为，一方面，资本生产视界是商品交换视界的根据；另一方面，商品交换视界是对资本生产视界的遮蔽。就前者而言，张梧批评了一种流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先出现了商品经济，然后再出现了资本主义。似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面先写商品，然后再写资本，这是符合历史的进程，应当说是先有一个商品出现，然后再有资本主义的出现。但是在张梧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由商品经济所决定而来。原因何在？张梧指出，《资本论》中，马克思区分了商品流通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商品－货币－商品”的“为买而卖”，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一种是“货币－商品－货币”的“为卖而买”，其中出现了价值增殖。如果按照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理解资本主义生产，那么价值增殖便无法解释，因为“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所以，价值增殖的秘密不在商品流通领域，而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价值增殖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劳动力商品化在表面上采取了商品交换的外观形式，但其实质却是生产关系。当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商品化的实质在于生产关系之后，他便发现了劳资交换中的剥削与压迫，这便是商品交换视界的盲区。马克思之所以能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看不到的东西，是因为他完成了从商品交换视界到生产方式视界的视域转换。

就后者而言，张梧指出，商品交换视界对资本生产视界的遮蔽使得资产阶级社会“正当化”。何为“正当化”？这里指的是，剩余价值在商品交换视域当中被看成是等价交换，资本家的剥削都被合理化、合法化、被“洗白”。因此，从两个视界去看待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具有双重维度，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现实界，后者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本质。从现象角度看，资本的物质载体、物质生产过程、商品交换体系、市民社会中的“人的独立性”、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平等原则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象界”；从本质角度看，与之相对应的资本的社会关系、价值增殖过程、劳动力的商品化、市民社会中“物的依赖性”、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与统治则构成了资

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界”。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了现象界的表象，从而忽视了本质性的内容。

第二个要阐明的重要问题是，《资本论》中两个视界的哲学意蕴。张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上述的双重维度，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持传统反映论模式的认识论。其一，传统的反映论模式无条件地信任认识客体，它根本无法意识到，作为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头足倒置的颠倒存在；其二，传统的反映论模式只能无条件地摹写认识客体，结果只能获得认识客体进入认识主体后的表象，而无法把握认识客体的本质。在此问题上，作为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断把自己分化为表象与实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表象与实质二重化的特点，在根本上决定了，要想真正把握社会存在，只能诉诸批判性认识论，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不过，在张梧看来，这种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形式化方法，而是基于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自我运动。这种辩证法要求我们不断把握社会现象的底层逻辑。

最后张梧对本场讲座主旨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要陷入“经济决定论”，也不要匍匐在社会生活的表象之上。正确的道路是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再出发，从商品交换视界深入到资本生产视界，这在哲学上意味着告别经验主义，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那一维度中去。

讲座结束后，张梧详细地解答了引起听众兴趣的诸多疑问。张米兰对主讲人表达了真诚的感谢，并表示将以丰富视域和多元线索继续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的后续专题，期待得到更多学界同仁的支持与参与。最后宣布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第一期圆满结束。

11、现代哲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 3 讲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现代哲学杂志社基地、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三讲在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锡昌堂 103 室和腾讯会议线上线下同步开讲。本讲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原主任张神根研究员主讲，主题为“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主持

人，共有来自校内外的300余位师生参加。

在报告开始前，马天俊教授作了开场致辞。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是科学有效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次讲座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和拓展，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关系的思考。随后，马天俊教授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张神根研究员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

张神根研究员在报告中首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今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大，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重大原则的认识不断丰富发展，为新时代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素材。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党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而改革开放更是探索的新起点，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打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经过40多年的不懈奋斗和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此次讲座从三个方面探讨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密切联系：一是改革开放起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二是全面改革开放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三是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

关于改革开放起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张神根研究员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别于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本前提。张神根研究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基于科学有效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状况的清晰了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既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又明确指出了现代化建设所应遵循的路径，规定了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而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

关于全面改革开放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张神根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十多年的实践揭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在这一时期，党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更加坚定地推动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功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在领导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完善。

最后，张神根研究员对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进行了解读。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进一步概括，有效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第一，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第二，对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点。第三，提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张神根研究员认为，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成功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迸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报告结束后，张神根研究员就讲座内容与参会师生进行交流探讨。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必须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摆在首要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兼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如何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两个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二者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的问题，张神根研究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社会主义性质，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则更多强调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和阶段性特征，主要反映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所展现出的崭新面貌即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现场交流环节结束后，马天俊教授进行总结。他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张神根研究员从纵

向与横向的时空维度展开相关论述。所谓纵向，即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线索来谈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所谓横向，即从西式、苏式等不同类型的现代化模式对比来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此次讲座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有关思想与实践大有裨益。

在讲座的最后，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罗嗣亮教授向张神根研究员赠送纪念海报，并合影留念。

12、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 2 季第 3 讲

2023 年 5 月 23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二季第三讲在线上成功举办，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伊恩·麦肯锡（Iain MacKenzie）教授主讲了“两种批判的实用主义”（Two Kinds of Critical Pragmatism）。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与硕博连读生陈思静担任学术翻译，本次讲坛有近百名观众在线参与。

户晓坤向听众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与讲座流程。麦肯锡教授是肯特大学批判思想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研究领域为政治和哲学的批判传统，出版了《抵抗与真理的政治：福柯、德勒兹、巴迪欧》、《纯粹批判的理念》等多部专著。

麦肯锡将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束缚概括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想挑战一个鼓励人们随心所欲行事的制度，应该怎样做？问题不仅在于人们如何被新自由主义所束缚，而且在于各种抵抗形式为何强化了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削弱其对自身的束缚？上述情形迫使我们考虑一种将哲学本身作为实践形式的方法，即实用主义。

麦肯锡继而指出，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认识到，批判思想旨在反对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那些简单地假定其创始公理的给定性的主张），但他强调批判传统本身导致新的狂热主义，开辟了新的宗教信仰形式，陷入了信仰主义危机。麦肯锡接受批判思想中所出现的信仰主义危机，但旨在从批判传统本身中找到挑战信仰主义资源的路径，即建立一种非相关主义和非代表主义的批判思想，关键是以一种保留偶然性的方式来阐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我们如何认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先验条件。

最后，麦肯锡在澄清和评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所划分的两种批判的实用主义——话语实用主义（discursive pragmatism）和机械实用主义（machinic pragmatism）的基础上，认为机械实用主义是摆脱新自由主义双重束缚的唯一可被辩护的方式。麦肯锡认为，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束缚，我们能做的是“通过创造性的概念化在自身代表他人说话，并通过对经验学习的开放性倾听对你说话的他人”。只有这种持续的双重选择过程，才能使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关于人们随心所欲行事的主张形成批判性的干预。

报告结束后，汪行福对麦肯锡的报告内容作了三点评论。第一，他认同麦肯锡对新自由主义双重束缚的判断。新自由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并非是全新的，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概念已经包含了此种逻辑。如果用资本代替绝对精神或普遍理性，“理性的狡计”也可用于解释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第二，麦肯锡认为当前社会和政治生活被自由主义的超级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超级集体主义这两种狂热思潮所撕裂。而它们都可以被视作主观主义的极端形式。梅亚苏认为现代思维的所有形式都是相关主义的，主观主义是普遍的哲学倾向。相关主义起源于启蒙运动对前现代迷信的批判，它拒绝所有未经主体及其理性检验和接受的教条主义，又由于取消了真理的客观基础而落入它想要克服的教条主义。梅亚苏对相关主义的批判是否类似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主观理性的批判？梅亚苏可能与后者共同面临的理论困境是，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落入非理性的深渊，那么社会批判所依赖的规范性基础是什么？

第三，两种批判的实用主义的含义以及二者的关系。话语实用主义者认为“给出理由和要求理由”的话语性实践是重要的社会实践。这一活动必然是主体之间的，因而包含着克服超级个人主义的机制。然而，由于社会实践所依赖的理由来自社会规范和规则，话语实用主义的批判很容易被指责为与它所要批判的社会现实的合谋。麦肯锡所倾向的机械实用主义的批判在认识论上满足了非相关主义的要求，但仍需处理两个问题：积极的集体政治行动中的动机问题与协调问题。汪行福认为应对新自由主义双重束缚的可行哲学框架或许是两种批判实用主义在两个层面的结合，即认识论层面的审美想象与话语证明的结合，以及政治层面的个人反抗与集体行动的结合。

麦肯锡对汪行福的评论作出了回应。首先，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和形成时，麦肯锡认为自己更侧重于政治活动和语言层面，但并不与更唯物主义的方式

相对立。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先验感性主义可以将布拉西耶等人持有的先验自然主义包含在内，这是麦肯锡本人倾向于前者的原因之一。其次，话语实用主义者认为规范性基础是嵌入在话语能力之中的，机械实用主义者不反对这一点，但认为应重新评估规范性基础；前者基于已知的领域来反思概念如何更好地在世界中发挥作用，后者则思考概念运作如何让我们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以改变世界。最后，如果致力于话语实用主义，我们有可能将机械实用主义带来的创造性实践排除在外，而后者可以将询问和给出理由的空间包含在内。

评论结束后，讲坛进入讨论环节，麦肯锡对同学的提问进行了回应。

在讲坛的最后，麦肯锡衷心感谢了主办方与参会人员。户晓坤对本次讲坛进行总结，期望可以邀请麦肯锡教授和汪行福教授莅临中山大学，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

13、现代哲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 4 讲

2023 年 5 月 29 日上午，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现代哲学杂志社基地、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四讲在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园锡昌堂 515 室和腾讯会议线上线下同步开讲。本讲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的文献》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高长武研究员主讲，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五个基本问题”。讲座由《现代哲学》副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教授担任主持人，共有来自校内外的 500 余名师生参加。

报告开始前，周春健教授作了开场致辞。他指出“两个结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命题，研究“两个结合”既可着眼于整体，亦可侧重于部分。本次讲座有益于我们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基本问题，对于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随后，周春健教授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高长武研究员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

高长武研究员在讲座中首先指出，深入探讨“第二个结合”与当前党中央关于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号召相契合，是学术界亟需推进的重大课题。此次讲座主要围绕“第二个结合”的五个基本问题展开：一是为什么结合，二是能不能结合，三是把什么结合，四是结合成什么，

五是怎么样结合。

关于为什么结合，高长武研究员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坚定实践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从认识和实践的客体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唯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积极求变、勇于革新，自省自觉、自信自强，才能蓬勃发展。从认识和实践所处的时空条件和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来看，“第二个结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来激活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于能不能结合，高长武研究员基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出解读。就理论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内在契合和相互融通之处，二者相结合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就实践层面而言，“第二个结合”是对新时代党的实践经验所作出的深刻总结，也是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所得出的重大历史性成果。

关于把什么结合，高长武研究员从两个概念着手进行分析。第一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能够概括事物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内容，对于这个概念，要抓住“基本”这两个字。第二个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和丰厚滋养，对于这个概念，要抓住“优秀”这两个字。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党长期探索积累形成的一个重要规律性认识和历史性结论。

关于结合成什么，高长武研究员围绕理论创新、文化更新和文明演进三个维度进行阐述。从理论创新维度看，就是不断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从文化更新维度看，就是建设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进文化；从文明演进维度看，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于怎么样结合，高长武研究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正确结合；二是抓住契合融通之处，进行有机结合；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和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切实结合；四是培养复合型人才，为进行结合提供高素质人才支撑。

报告结束后，周春健教授进行总结。他指出，“第二个结合”开创了党的理论创新新格局。高长武研究员深刻剖析了有关“第二个结合”的五个基本问题，

既注重文献分析，又强调现实指向。本次讲座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第二个结合”的相关问题，为更好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根本途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最后，高长武研究员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相关问题，同线上线下的参会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交流。

14、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66 期

2023 年 5 月 30 日下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420 课室举办了第 66 期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本期研习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百余位师生参加。

研习会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张觅主讲，主题为“辩证法与现代主权哲学——卡尔·施密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观念史重构”。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兴赛副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旭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在报告开始前，主持人王兴赛向与会师生表示欢迎，介绍了主讲人和评论人。

张觅报告的主题是，施密特围绕“主权—专政”问题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进行的观念史重构。

在正式进入核心议题之前，张觅首先对施密特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关系作了勾勒。马克思主义是施密特终其一生所面对的重要思想主题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批判散布于他的众多重要著作。施密特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法权批判那里得到了持续的启发；另一方面，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批判在某些决定性的方面正向厘清了自身思想的基本概念和立场。

张觅进而分析了施密特“主权—专政”学说的法理学要素。其一是辩证法与主权专政的概念。施密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的标准就是区分友敌”这一政治概念以及“主权者就是决断非常状态者”这一主权学命题联系在一起。其二是“具体的例外”与法权的物事化。张觅澄清了在施密特的专政概念中内容与形式的区分以及专政同“具体的例外”之间的关系。

张觅系统地解读了施密特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观念史重构。其一是自然法的两种类型与社会主义的两种类型。所谓的自然法的两种类型，施密特称之为“正义的自然法”和“科学的自然法”，并提出，在这两种类型的自然

法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其二涉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主权专政。施密特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哲学的解读较为鲜明地反应了他对现代专政概念之观念史重构的“系统性”。其三是黑格尔的历史—意识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明证性。专政概念本质上包含着一种具体的否定性，因为专政本质上是一种对阻碍法之实现的具体现状的否定和克服。其四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内在论历史哲学中的“行动自由”。施密特既批判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改革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术语误解，又批判了其以社会发展的有机理论为依据拒绝作为这种有机性发展之“例外”的革命和专政。

至此，张觅完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他总结道，施密特将另一对观念和政治行动方案纳入到关于现代专政概念发展的整体考察中，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直接相关，亦即无政府社会主义的革命观念同 1848 年革命时期复辟的天主教国家哲学家的专政概念。

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了评论环节。

张旭充分肯定了张觅报告的学术严谨性和鲜明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对施密特的主权—专政概念细致入微的分析，对卢梭同质性民主概念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精当深刻的剖析，以及基于德文原著对《论专政》和《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论证结构的精密梳理，其思想深度超过了国内学界此前对这两本著作的介绍。张旭针对报告提出了几个扩展性的问题。首先，在 1927 年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和《宪法学说》之后，专政与主权概念在施密特思想中的地位是否有所下降？《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中的卢梭的同质性民主的概念在 1923 年和 1926 年的文本中是否有很大的差异？其次，施密特在《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判定“议会民主制已死”，而该书的附录和引论所展示的托马与施密特的论战是否显明，托马（以及韦伯、凯尔森、海勒）对议会民主制的捍卫在魏玛共和国中退居到次要地位，而施密特的批判作为当时的“保守主义革命”成为主流意见？从 1923 年的文本来看，是否能看出施密特批判魏玛的议会民主制到底是辩护性的还是攻击性的？再次，施密特批判议会民主制的思想在今天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美国的社群主义的论战中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当今的自由主义是否能像战后德国自由派 Herzog、von Arnim、Böckenförde 等人改造施密特那样吸收施密特的思想？最后，《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的第三章施密特论述了马克思的阶级专政观，第四章论述了索雷尔和墨索里尼的暴力论，而前两章实

际上暗含了对韦伯的很多批判性论述，因此，如果能考察一下韦伯、马克思、施密特三位思想家的立场冲突以及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君主制灭亡后面对的英国议会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德国的独特道路等不同政治方案的选择困境，会更有助于理解施密特的《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这部政治思想史名著。

黄涛认为本报告关于卢梭“神圣立法者”和黑格尔“辩证法”在主权哲学中的解释相当具有启发性，在肯定报告一系列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黄涛认为，报告应更加清晰地呈现施密特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观念史重构的整体链条，并对“决断”这一施密特思想的核心概念在主权—专政问题中的位置作出说明。黄涛指出，马克思在根本上反对政治生活，而施密特则无条件捍卫政治，如何在更根本的意义上理解二者的这一差别？另外，施密特所谈的例外状态，往往是规范法学的例外，如何进一步理解“规范”和“例外”的辩证法？

张觅对上述评论和问题逐一作了回应。

接下来，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叶甲斌博士后、王兴赛以及线上学友就有关话题与张觅作了进一步的交流。

讨论结束后，王兴赛向张觅赠送讲座海报，并对张觅、张旭和黄涛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与会师生对本期研习会的关注和支持，宣布研习会圆满结束。

15、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 2 季第 4 讲

2023 年 5 月 31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二季第四讲在线上举办。本期主讲人为国际知名劳动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教授主讲“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Rentier Capitalism, the Precariat and Basic Income）。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猛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叶甲斌博士后与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学术翻译，本次讲坛逾百名听众在线参与。

户晓坤简要介绍了本次讲坛的主讲人、评论人及讲坛流程。斯坦丁是国际知名劳动经济学家，致力于基本收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其代表性著作已被翻译成 24 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

斯坦丁在报告中首先阐释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着重阐明了当今全球食利资本主义兴起的状况及其根源。斯坦丁指出，经济大萧条等系列事件发生在20世纪经济与社会“脱嵌”（dis-embedded）时期，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以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嵌入（re-embedded）社会，这一时期资本向无产阶级做出让步；20世纪70年代后，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国际协议的达成为标志，形成了与新自由主义相悖的“全球食利资本主义”形式，越来越多的收入流向财产所有者——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所谓的知识产权，而越来越少地流向劳动者，世界各地财富不平等现象增加。

斯坦丁进一步指出，食利资本主义导致了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at）这一新兴大众阶级的兴起，不稳定无产者具有独特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他们拥有不稳定、不安全的劳动，在工作场所之外和劳动时间之外一样受到剥削和压迫。他们依赖微薄的、不稳定的货币工资生存，缺乏非工资性福利，并且系统地受到租息机制的剥削，持续处于债务之中。最能定义不稳定无产者的是其与国家的独特关系，他们不具有公民的权利和待遇，而沦为祈求者。在不稳定无产者下面存在一个不断增长的流氓不稳定无产者（lumpen-precariat），这一底层阶级警醒着不稳定无产者不要陷入更糟糕的生活。斯坦丁认为，不稳定无产者是21世纪的核心工人阶级，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他基于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政治态度，将不稳定无产者区分为“返祖者”“怀旧者”“进步者”三类，认为其中受过教育、积极寻找替代性规范的“进步者”群体，有可能成为新的进步政治先锋。

斯坦丁指出，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越来越普遍而具有全球规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不断的转型时代，一个长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社会和经济冲击屡见不鲜的今天，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波及范围是不确定的，有一份工作远远不能保证人们摆脱贫困或经济不安全。斯坦丁由此强调，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旧的政策在对解决新危机都是无效的，必须采取更积极的预防措施来控制局势。有鉴于此，斯坦丁提出了基本收入的主张，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由国家提供适度的基本收入，每月单独支付，而不考虑任何附加条件。他进一步基于正义、自由和基本安全等方面从哲学上做了简要论证。同时，在社会经济上，基本收入还可以作为自动的宏观经济稳定器。斯坦丁认为，基本收入政

策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实验，其积极作用已有所体现。

报告结束后，马天俊进行了评论。首先，他认为斯坦丁结合基本收入问题对不稳定无产者的阐释，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为宝贵。接着，他向斯坦丁请教了三个问题，第一，流氓不稳定无产者的政治性质是怎样的？第二，不稳定无产者中的“进步者”不认同资本、不认同劳工也不受虚假意识影响，这一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是什么？第三，基本收入的尝试似乎仍然将现代国家作为预设前提，基于此，如何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叙事中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

吴猛认为斯坦丁的工作兼具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特征，表现出对于当代社会的深刻洞见。他向斯坦丁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报告勾勒了资本主义演进的连续性路线图，但是否适用于包括后发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有待商榷；其次，“进步者”何以在不接受“虚假意识”影响的前提下寻求“替代性的现实”；最后，“基本收入”政策的具体方案现实性何在？

斯坦丁首先回应了马天俊的问题。他以女性孤老综合症（bag lady syndrome）为例，描述了流氓不稳定无产者流落街头的生活情景。这些无家可归、自杀等现象，对不稳定无产者构成一种恐惧式规训，并制造人们对少数群体、女性和残疾人等的仇恨敌对。接着，他指出“进步者”不仅有主观条件，而且具有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与工作分离程度较高等客观物质条件。最后，他认为“基本收入”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削弱国家对公民干预的有效政策。现代国家仍是今天的现实，但基本收入有利于发展自由，尽管绝不是万能的。

针对吴猛的提问，斯坦丁首先肯定了每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但他强调当代学者必须意识到全球食利资本主义正在形成；其次，他再次重申了“进步者”与其工作的高度分离等客观条件，并且希望国家和政府能够重视他们的诉求，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最后，他以基本收入政策曾在印度、威尔士、加拿大等多个不同国家或地区推行的经验和成果回应了这一问题。斯坦丁介绍了这一政策的积极效果，例如有利于人们长期的身心健康、改善人们特别是儿童的营养情况、学校出勤率和学校表现、促进女性的独立和解放、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生产力、增加社会的共同体与团结意识等。

在问答环节中，听众踊跃提问，斯坦丁回应了其中的焦点问题。针对“基本收入是否应只给予不稳定无产者”的提问，斯坦丁强调，基本收入是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并且，如果只给予不稳定无产者福利，人们容易落入贫困

陷阱（poverty trap），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贫困，这无疑违背了基本收入政策的初衷。

最后，斯坦丁衷心感谢了主办方与参会人员。主持人户晓坤对本次讲坛进行总结，认为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变化这一主题上，斯坦丁教授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基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和思考路径，探讨了基本收入作为解决方案的现实条件及其有效性，呈现了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期待有机会邀请斯坦丁教授莅临中山大学进行更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16、实践哲学讲堂第 35 期

2023 年 6 月 6 日下午，实践哲学讲堂第 35 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515 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堂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兰芬教授主讲，主题为“试析‘理性’与‘实践科学’的关系——以法拉比、西那为例”。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堂的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清江副教授担任评论人。本期讲堂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共有 20 余位师生参加。

在报告开始前，徐长福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实践哲学讲堂系列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隆重介绍了本次讲堂的主讲人和评论人。

李兰芬在正式报告前提出，虽然本次报告举例的法拉比及西那是阿拉伯哲学家， 但根本上是想将“理性”与“实践科学”的关系问题放在一个与哲学相关的宗教哲学范围里进行讨论。由此出发，李兰芬首先介绍了两位思想家及其相关背景。 其一，阿尔·法拉比是阿拉伯柏拉图主义的奠基者，被推崇为穆斯林哲圣。其二， 伊本·西那亦称阿维森纳，被称之为亚氏著作“最富原创性的注释者”。其三，铿迭最早把古希腊哲学引入伊斯兰国家，哲学与伊斯兰信仰交融在一起，本报告所用“阿拉伯哲学”，指地域中与伊斯兰教信仰相关的哲学。

接着，李兰芬分析了阿拉伯哲学的思想来源。其一涉及阿拉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宗教与自然、本体与存在等问题。其二涉及自然哲学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其三包括犹太教信仰，即坚定和深刻的一神论思想。因此，阿拉伯哲学关系到人的德性与宗教性的关系问题（伦理与宗教）、人的理性与宗教神圣性的关系问题（哲学与宗教）和人的理性与宗教实践性的关系问题（理论与践行）。

李兰芬就此介绍了阿拉伯世界的著名哲学家。首先是作为第一位阿拉伯哲学

家的铿迭，他的哲学思想涉及人类灵魂、人的认识和灵魂的四种认识与四种形式。其次是作为第二导师（“哲学亚师”）的阿尔·法拉比，他的哲学思想涉及存在形式及认识形式中的理性作用、科学分类及理性分类，也留下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是伊本·西那，他的哲学思想涉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认为科学为哲学提供现实的认识基础，哲学为科学提供理论证明，既肯定真主的永恒性，又坚持物质世界的永恒性。最后是安萨里，他的哲学思想以“真主创世说”为核心， 试图重建伊斯兰教正统信仰，他通过考察各派的思想和反求理性的认知能力， 区分“知的领域” 和“信的领域”，强调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追求真理方式。

最后，李兰芬补充了伊本·路西德（阿威罗伊）的哲学思想。伊本·路西德在存在论上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不可分割说，并吸收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 补充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和动力因说，深入分析了理性的定义与作用以及理性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伊本·路西德持有双重真理观，即神学的真理在哲学看来不一定是真理，哲学的真理在神学看来也不一定是真理，两种真理独立存在，互不干涉。

以上主要内容讲述完毕，李兰芬总结道，宗教哲学视域下的“实践”，与理性关联，并且这种关联从古希腊哲学那里被明确为知识的分类之一种。这意味着“实践”不仅是与知识之认清、分辨及限制有关的作为。从实践科学刻意表达及被阿拉伯哲学家进一步扩展、与人的德性养成相关的含义上看，有价值选择的意味。 与宗教信仰关联， 便是指向走向神圣的修身功夫。

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了评论环节。

评论人江璐就三个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第一，李老师最初引用了马坚和黑格尔等人对阿拉伯哲学的评价，而他们的观点是带有偏见与误解的，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同理，恩格斯解读了阿威罗伊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一点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第二，尽管路西德属于保守主义，但他的观点透露出离经叛道的倾向，这是如何调和的呢？第三，根据双重真理论，宗教用来使大众服从，而哲学只属于少数能思考的哲学家，那么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何在？哲学家是否可以通过理性逾越这一鸿沟？普罗大众是否可以通过信仰逾越这一鸿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宗教的超越性又如何理解？

评论人张清江从三个方面向李兰芬请教。第一，安萨里明确划分了知与信的

领域， 同时又强调真主的绝对统治，那么在知的领域中，真主的命定与人的理性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第二，在信的领域中，人如何通达对神圣的理解？第三，既然理性的类型包含了与神圣相关联的内容，那么阿拉伯哲学家所谓的“理性”是否不同于如今一般意义上所谓的理性概念，而是包含“理性”与“灵性”两个部分的更广义的理性概念？

李兰芬对上述评论作了简要回应。首先，李兰芬承认后世作家对阿拉伯哲学存在偏见，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资料与文献的缺失，因此她本人也不完全赞同这些片面的评价。其次，路西德提出的双重真理论不同于其他哲学家的双重真理论，命定论、因果论等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深入到该思想家的整个哲学体系中细致探讨。再次，超越性可以根据文化进行分辨，阿拉伯世界所强调的神人鸿沟在中国文化里恰恰是不存在的。最后，哲学和理性的定义因人而异，没有统一的界定，只有具体的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分析的，也就是说，相比于在理性的普遍层面上达到一致，更重要的是在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具体问题上达到一致。

在讨论阶段，中山大学哲学系田书峰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胡艾忻博士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萍教授和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就有关话题与李兰芬作了进一步的交流。

讲座的最后，徐长福向李兰芬赠送了纪念海报，并与其他老师合影留念。

17、现代哲学论坛第 1 期

2023 年 6 月 7 日，由现代哲学杂志社、广东哲学学会、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现代哲学论坛”第 1 期在锡昌堂 103 室举行。本期论坛邀请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倪梁康教授主讲，讲座题目是“‘纯意识’研究及其‘困难问题’与‘容易问题’”，讲座主持人是朱刚教授。

倪梁康教授认为，在意识研究和意识理论方向上，目前有三门彼此独立的基础性学科在进行或少或多的合作研究：神经科学、信息科学与意识现象学。这个合作研究基于今日研究界对意识的三个定义：1）神经相关机制（准意识）；2）信息（类意识）；3）个体的主观体验或内心世界（纯意识）。它们构成不可再进一步还原的三位一体，并且进一步引出目前在意识研究领域清晰可见的三元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为此，这三门学科的工作是无法相互替代的。在纯意识研究中，意向相关项学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容易问题，而意向活动学需要处理的则是

困难问题。这里的困难问题之所以困难，乃是因为意向活动学要面对的是一个持续涌现、流动、变化和消失的意识构造过程。在反思中进行的现象学发生分析需要在意识活动的进行中直接地把握和获取这个活动的发生规律和结构规律。纯意识研究构成了准意识研究和类意识研究的基础，但它是有限的，不能取代其他的意识研究方式。

18、马克思论坛第 144 期

2023 年 6 月 18 日下午，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主办的第 144 期马克思论坛在锡昌堂 515 会议室开讲。本次论坛由厦门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徐梦秋主讲，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维度”。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担任本期论坛的主持人，哲学系暨马哲所徐长福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滨教授担任评论人。

论坛开始前，陈乔见简要介绍了徐梦秋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他指出，徐梦秋教授是国内“规范与规范性”研究的开创者，相信他的报告会使大家耳目一新。

徐梦秋在报告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中，用于描述其基本性质的虽有“实践性”“阶级性”“批判性”“革命性”“科学性”等概念，却没有“规范性”“规范性维度”“规范主义”这样的术语。当前，为了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与误解，并扩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很有必要引入和运用这些术语。不同于哈贝马斯等人的看法，徐梦秋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着规范性的内容和维度，而且有较为明确的规范基础。

报告从以下两个部分展开。

首先，为了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维度，首先必须说清楚什么是“规范性维度”。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有两个相对的术语，即规范主义和描述主义，也叫规范性维度和描述性维度。从基于某种价值观的“应然观”出发，对相应的实然性存在，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继而进行维护、矫正或重构，这个维度或进路就是规范性的维度。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普适的应然要求才是规范，才有规范性。儒家传统中的“舍生取义”“治国齐家平天下”等都蕴含着此种规范性维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规范性维度不仅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活动（如道德规范）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技术规范）。与规范性维度相对

的乃是描述性维度，也被称为实证性维度或解释性维度。不同的叫法侧重不同的方面。描述性维度、解释性维度、实证性维度对应着人们对事物认知的三个阶段，故可统称为认知性维度。规范性维度与认知性维度，说到底就是对待事物的两种方式：“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前者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看待，把主体作为万物的尺度去臧否、维护或改变现存的事物。后者则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看待，力图客观地认识事物。对待事物的这两种方式是相互依存的。可见，规范性维度不仅包含评价、褒贬的维度，还包含实操、实践即改变世界的维度。学界通常认为的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和描述主义的二分忽视了规范性维度的实践的方面，存在着片面性。此外，把认知性维度的活动和规范性维度的活动，看成两个先后继起、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是研究和叙述的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只是在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之后，才有规范性活动和认知活动的分离，才有谁先谁后的争论，才有休谟问题的提出。“是什么”和“应如何”原本就是二位一体，混溶发生的。二者联系的通道与其说是推理，不如说是基于活动和实践而建立起来的模仿和联想的机制。休谟注意到这一点，但他离开人类解决生存问题的劳动与实践，抽象地思考这个问题，因而难免陷入困惑之中。

其次，除哈贝马斯外，艾伦·伍德、米勒等对“马克思与道德”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在否定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存在规范性维度和规范性内容。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立足点是自然主义或客观主义的，而不是规范主义的。徐梦秋则认为，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存在比较明确的规范性基础的。诚然，在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前后，他的批判所依据的规范基础或者说规范性维度是不一样的。例如，他在莱茵报时期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的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和他在巴黎公社时期对镇压工人的资产阶级的批判，二者所依据的规范基础无疑是有区别的。而在世界观转变完成之后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在同一时期对待不同对象，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也是有差异的。例如，鸦片战争期间，他对英国殖民者的批判，和他对腐朽的清王朝的批判，二者的出发点就不一样：前者是站在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后者则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但是，不管各时期的差异有多大，有两个共性贯穿始终：一是以根植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为价值基石，以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为科学基石，融合这两大基石形成关于未来社会及其经济、政治、文化应如何的革命理想（应然观：自由人的联合体）；二是从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之空想

的革命理想（应然观）出发，既诉诸理论的武器也诉诸物质的武器（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实然），进行批判、解构，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构而奋斗。其中，第一个共性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事批判和建构的基础、依据和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第二个共性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所要批判的实然对象及其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建构的新世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判和社会建构的规范性基础或规范性维度，即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维度。此种规范基础或规范性维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应然观（革命理想）的统一；根源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阶级性）和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其特点是理论的批判和“物质”的批判的统一，道德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的统一；其理论上的贡献和实践中的成就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理想变成现实。可见，马克思主义引入的规范性概念不仅可以与原有的阶级性、实践性、批判性、革命性、建设性等概念相容，与科学性、实证性也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维度，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批判性、革命性等等与科学性的关系，说的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价值尺度和科学尺度的统一、应然尺度与客观尺度的统一，即融入了科学性的规范性。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一基础出发去批判、解构资本主义，颂扬、建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至此，可以给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性或规范性维度的完整表述：这是一个以无产阶级利益和科学历史观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应然观出发，批判违背无产阶级利益和历史规律的一切，维护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和历史规律的一切，建设符合历史规律和无产阶级及全人类利益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逻辑进路和实践过程。

徐梦秋指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规范性维度”这个词，但对于主体以自己的价值尺度、应然尺度去对待客体的这一维度，是有过比较充分的论述的。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对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批判，就是把作为人之本质的劳动本来“应如何”而资本主义劳动的实际“却如何”的巨大反差，作为依据和出发点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旧唯物主义仅仅以客体形式去看待事物，局限于“以物观之”，而新唯物主义以实践和主体的视域去看待事物，就是”以我观之”，这就是主体的规范性维度，而且突出了规范性维度中的实践要素。此外，

《资本论》中还涉及到技术工程的规范性维度。这都是哈贝马斯没有看到的。可见，马克思对规范性的内容是做了比较丰满的表达的。最后，徐梦秋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是与科学性互相依存的，一旦离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就会陷入空想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的窠臼。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又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即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达到应然与实然、应然与必然、已然和未然三者的转化与统一。

报告结束后，论坛进入评论和提问环节。徐长福认为，徐梦秋教授的报告论证充分、恰当其时，符合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旨趣，代表了经典的用“哲学原理”方式回应重大时代问题的进路，尤其值得青年老师和同学学习。林滨认为，徐梦秋教授的报告显示了深厚的哲学史功底和极强的思辨能力，论证之明晰堪称典范。哲学系硕士生赵婷婷、代文勃和徐长福教授还就如何理解今天的阶级现象、如何看待马克思前期后期规范性维度的变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有无继承以及规范性维度与规范性活动的区别等问题向徐梦秋教授请教。徐梦秋一一做了解答，并回忆了自己从事规范性研究的历程。他指出，回溯性研究和追踪性研究最终需要转变为学理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以避免困于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

最后，陈乔见教授向徐梦秋赠送了纪念海报。本次论坛圆满结束。

19、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 2 季第 5 讲

2023 年 6 月 27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二季第五讲在线上成功举办，由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教授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主讲，题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危机与实践”（Reification, Crisis, and Praxis in in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周凡教授、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叶甲斌博士后与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学术翻译，本次讲坛有百余名观众在线参与。

马天俊向听众介绍了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与讲座流程。卡沃拉科斯是国际卢卡奇协会的副主席，他最新的著作是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一项涉及实践

哲学的研究。今年正值《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出版100周年，100年来人们对其展开了热烈讨论。该书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思考也有重要价值。

卡沃拉科斯在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危机”一词在全世界的政治话语中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尽管危机似乎塑造着我们对自身生活和行为、情感和话语、以及未来的态度等的整体理解，我们远未寻得对危机概 念之确切含义的共同理解。卡沃拉科斯认为，卢卡奇的社会历史总体性（social-historical totality）方法可以将危机的各个方面重新结合起来，他进一步分析了卢卡奇所揭示的现代对象性形式带来的“物化现象”，以及这一具体的现代合理性的限度。卡沃拉科斯继而探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有关革命化实践之可能的思想。卢卡奇将他的危机理论与革命的“时机”（Augenblick）理论相结合。危机对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时期而言是必要但不充分的先决条件，而人的意志在革命时机中可以成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时机代表着根本性的新事物的出现或集体主体的实践性自我决定，代表着对占主导地位的沉思行为的二元论的积极克服。如果说沉思性实践是建立在物化的计算合理性之上的，那么革命化的实践则对应于给定世界的历史化、对渗透其中的对立倾向的承认，以及通过强化这种代表了历史中新事物的倾向而实现的去物化。

卡沃拉科斯认为，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是一位列宁主义者，他坚定地主张先锋党是革命成功的适当手段。革命化实践的集体主体需要一个中介，在日常意识和理论上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发挥作用。卢卡奇认为共产党代表了经验性的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真正的中介形式”。在卡沃拉科斯看来，卢卡奇以其复杂的物化、危机、去物化过程以及政治组织的角色的理论，从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角度详细论证了革命政党政治的重要意义，并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和政治解放的更迭与困难进行思考的路径。

周凡围绕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对卡沃拉科斯的报告作了评论。如何理解卢卡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理解卢卡奇政治哲学的要点，需要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辩证分析。周凡指出，1921年6月前后，卢卡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当对卢卡奇1920年的《阶级意识》与1922年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两篇文章作出区分。卢卡奇在1922年的文章中不再使用“imputed consciousness（zugerechnet Klassenbewußtsein）”。这一概念被译为“被赋予的阶

级意识”或“被赋与的阶级意识”，乃是将卢卡奇 1920 年的思想过早地列宁主义化和过度地列宁主义化的结果。卢卡奇只是在 1920 年《阶级意识》一文中使用过“zugerechnet”来修饰“Klassenbewußtsein”，其首要关切是回应其老师马克斯 •韦伯的问责，展示了卢卡奇对无产阶级自觉的自我批判的强调、并与韦伯的个人伦理相区分的政治意识。周凡认为，卢卡奇在 1919 年至 1920 年受卢森堡主义的影响要远大于列宁主义的影响，在 1922 年到 1926 年期间，卢卡奇调整了自己与列宁主义的关系，并重新阐释了政治中介的概念，上述具体的差异需要卢卡奇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究。

户晓坤指出，卡沃拉科斯将 21 世纪的复杂危机表现形式在社会历史总体性的维度上引入了卢卡奇的概念体系中，一方面基于卢卡奇对象性形式的社会本体论和认识论来界定危机概念，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失效的危机状况作为现实前提。在连续性与危机时刻的非连续性的辩证法中，革命化实践包含了超出合理化形式的一种新的现实概念，将矛盾性动态总体呈现出来，而引发社会生活条件变革的可能性正蕴含其中。如果将危机把握为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的关键时刻，必然需要一个先锋队政党作为中介，将日常意识和阶级意识相连接。卡沃拉科斯提及存在着退回到官僚化组织模式的危险，因此革命政党政治的批判理论是必要的，这一批判理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如何能够抑制上述倒退？

卡沃拉科斯对上述评论作了回应。对于周凡的评论，首先，他同意周凡指出的卢卡奇在 1919 至 1922 年间的观点变化。《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确反映了卢卡奇从卢森堡转向更列宁主义的立场的过程；其次，正如周凡指出的，卢卡奇在 1925 年的《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再次阐述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卡沃拉科斯认为，卢卡奇并没有在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的调节性理念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也没有将其作为处理社会现象或社会学中的因果性问题时的认识论概念。卢卡奇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理想类型、客观可能性等概念，作为对正在社会现实中生成的事物进行理论化的社会学概念，显示了一种超越社会现实的方式。从具体内涵来看，客观的可能性是指与解放运动中经济和政治维度的统一相对应的意识以及政治实践。

对于户晓坤的评论，卡沃拉科斯认为，在对象性形式没有被根本打破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一框架之内总是面对着物化和去物化的辩证关系以及困境，官僚化也是一种物化结构。卢卡奇的政治哲学在面对现实主义的和更理想主义的或规范

性立场之间的张力时，同时考虑了这两个维度。从现实主义的立场，纪律可以将自由和团结的组织原则结合起来并抵制退回到资产阶级政党的物化结构。在危机时期，能够表达、团结和增强群众意志的解放性政党政治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讲坛的最后，卡沃拉科斯衷心感谢了主办方与参会人员。马天俊对本次讲坛进行了总结，指出这一论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期望可以邀请卡沃拉科斯教授莅临中山大学，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

20、现代哲学论坛第 2 期

2023 年 6 月 27 日下午，由现代哲学杂志社、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现代哲学论坛”第 2 期在锡昌堂 515 会议室进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杰出人文教授谢地坤主讲，主题为“否定哲学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现代哲学》副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马天俊教授担任本期论坛的主持人，哲学系方向红教授、朱刚教授担任评论人。

谢地坤从对哲学本质问题的讨论开始本次讲座。在谢地坤看来，哲学是一门人类依靠其智慧去追求真理的学问，且它自始至终存在着怀疑和否定的要素，这种要素意味着人在意识层面冲破既定现状和深层假设。基于这一判断，谢地坤在讲座中阐明了否定哲学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谢地坤首先刻画了否定哲学的诞生和初期发展。公元 6 世纪狄奥尼修斯提出“否定神学”的主张，不同于要求理性服从信仰的奥古斯丁主义，否定神学认为人的有限理性不能证明上帝存在，因此不对上帝做出任何规定的否定性表达才是对神的最好表达。15 世纪库萨的尼古拉继承和发扬了否定神学中的否定和批判品质，他的讨论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阐释认识论上的“学识的无知”；第二，说明“猜想”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第三，得出本体论上“否定神学”的结论，表明人类知识无法论证上帝这个观念的最大值。

谢地坤进一步阐明，欧洲哲学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洗礼得到了充足发展，但也却出现了如下情况：经验论陷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唯理论变成赤裸裸的唯心主义。面对这个挑战，康德先提出怀疑、批判（首先就是否定），再到建构的立场，这使他开辟出否定哲学的道路。康德建基于否定思维的批判哲学完成于《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1）《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

就是要使作为理论理性的纯粹理性首先经受住一种消极的、否定的批判，然后才对实践理性展开积极而肯定的批判；（2）康德在讨论现象与本体的关系中，强调了本体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否定意义；（3）康德通过对独断的观念论的反驳和否定，论证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4）康德论述了四组二律背反的矛盾命题，指出人类关于超验领域的知识缺少充足的客观性论证，因此，必须提出反题来否定正题，使之相互排斥。二律背反的学说达到了康德辩证法的顶点，经过费希特的正、反、合的补充和发展，到黑格尔这里就形成了矛盾普遍存在的思想，进而发展为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这条规律。黑格尔通过以否定为核心的辩证法将德国古典哲学推向高峰。黑格尔把哲学的否定性要素视为哲学本质——理性和自由——的最重要的显现。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辩证逻辑的核心理解为其具有的否定性意义，而《逻辑学》则贯穿了矛盾、否定和扬弃思想。

谢地坤继而指出，在黑格尔之后，德国否定哲学的发展经历过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9 世纪的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试图颠覆德国古典哲学。但 20 世纪中叶，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完全继承了否定哲学的传统，他们不仅在《启蒙辩证法》中对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否定哲学予以发挥，而且通过建构否定辩证法，将否定哲学推向新高度，从而对现代工业社会展开了尖锐批判。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表明了否定思维对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既往的同一性思想、体系思想、本体论思想与独断式的观念论、唯心论，甚至某种信仰教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阐明否定哲学的发展历程后，谢地坤总结道，否定思维是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只有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才能发挥思想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反映真实、改变世界的真理。

在评议环节，方向红指出，虽然阿多诺的否定哲学批判现象学，但两者存在诸如强调非同一性、打破对象性、打破概念拜物教等相似之处。方向红还提出不同意义的“否定”概念、“辩证法不给出肯定”以及“否定哲学是否导向相对主义”等问题。朱刚高度肯定了此次讲座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作为哲学本性的否定对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朱刚也指出否定哲学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列维纳斯的现象学的不谋而合之处，此外还提出了否定的形态和和否定的层次的问题，如康德批判意义上的否定与黑格尔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最根本的否定是主体思想，还是世界自身？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哲学系师生与谢地坤进行了多维度的学术探讨，并在讲座最后合影留念。

21、现代哲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 5 讲

2023 年 6 月 29 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现代哲学杂志社基地、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第五讲在腾讯会议开讲。本讲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陈曙光教授主讲，主题为“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讲座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主持人，共有来自校内外的 500 余名师生参加。

报告开始前，马天俊教授作了开场致辞。他指出世界大变局是涉及世界经济地理、全球治理格局、国际政治版图等诸多领域的整体性动向，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西方中心论的破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是这场世界大变局的深层意蕴。本次讲座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关键议题的意涵及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随后，马天俊教授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陈曙光教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

陈曙光教授在讲座中首先表示，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美好的全球共同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构各民族国家普遍认可的人类文明，即全人类普遍交往中共同遵循的交往理性、文明规则。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演进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此次讲座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人类文明的出场，二是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传统人类文明的影响，三是人类文明重构的契机，四是建构人类新文明的基本方向，五是新文明类型。

对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人类文明的出场，陈曙光教授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史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从此诞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文明打上资本的烙印，而西方文明也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底色。但西方主导建构的传统人类文明却日益呈现出非正义的性质。

对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传统人类文明的影响，陈曙光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从道义上宣判了传统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并指引了世界范围内的正义运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标志着世界正义力量的强

劲崛起，改造传统人类文明迎来了历史性契机。但由于多种原因，传统文明格局的重构未能真正实现。

对于人类文明重构的契机，陈曙光教授认为，世界大变局根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就其深层结构和本质维度而言，更是涉及全球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人类文明的重构。传统人类文明对全球社会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人类文明再次迎来历史性重构的契机。

对于建构人类新文明的基本方向，陈曙光教授表示，人类新文明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而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重构人类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当今世界共同难题，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

对于新文明类型，陈曙光教授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元哲学层面的人类文明新理念，是指引未来道路的最高理念，是为中国所把握的世界精神，更是一种为实现人类文明的革命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重构，凝聚全球发展共识与合力的可能的人类新文明类型。

报告结束后，马天俊教授进行总结。他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陈曙光教授结合当前世界大变局的形势，深刻剖析了有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问题。其中，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联系，人类文明交往的规范性，人类文明重构的契机，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意义等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有关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大有裨益。

最后，陈曙光教授就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关问题，同线上参会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交流。

四、主办会议

1、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 2023 年工作会议

2023 年 4 月 27 日下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 2023 年工作会议”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515 会议室召开。在会议一开始，徐长福教授就会议召开的原因、参会人员以及会议的具体环节做了简单介绍，同时对各位师生于百忙之中参与此次会议表示感谢。

会议第一环节由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主持。王兴赛副研究员首先就中心的基本情况做了汇报：他回顾了中心成立的缘由、发展历程以及主要学术活动，聚焦于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研讨会、读书会、出版物等方面；他还对中心未来工作安排做了介绍，聚焦于2023年实践哲学会议的规划。

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张伟教授对于实践哲学研究中心长期以来的工作做出了肯定。首先，他高度赞扬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在现有条件下取得的丰硕成果，无论是实践哲学方向的会议、 讲座，还是系列出版物，都值得肯定；其次，他高度评价了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内容上的多元化，指出其融合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多方向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心宗旨；最后，他对于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未来规划给予了极高的期待，希望以未来的“实践哲学年会”等为依托抓住自己的内核、扩大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形成和提高中心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马天俊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与中山大学实践哲学中心发展的渊源，特别强调了自己参与其中的一系列活动。其次，他肯定了中心未来的规划与设想，认为实践哲学系列活动的整合与升级具有创新性，有益于中心的长足发展。最后，他针对“实践哲学年会”中“继开学园”的开设以及年会的命名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助理户晓坤教授高度赞扬了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并围绕着中心学术研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做了简要介绍。户晓坤高度肯定了中心在人才培养工作上的成果，表示将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心未来的工作。

梅谦立教授对于2023年实践哲学年会主题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主题既关乎当下的现实，又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同时，他也肯定了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对于与国外学界进行交流的重视，认为有必要更为密切地加强与国外学界的对话，特别是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

龙霞副教授简单回顾了自己与中心成立和发展相关的一系列经历，对于中心的规范化和规模化以及中心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情怀做出了肯定。同时，她认为实践哲学年会系列主题的设置与其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将不断支持中心的发展。

江璐副教授高度赞扬了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开展的诸多学术活动，同时她简单介绍了德国实践哲学的发展以及自己目前翻译实践哲学相关书目的

规划，并表示愿意为中心与国外学界的交流和对话做出贡献。

会议第二环节为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团队的具体工作安排和任务落实，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璇教授、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永欣副教授、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刘习根副教授、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守奎教授、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胡志刚副教授、南开大学哲学学院周宏胤博士后等相继发言，为中心发展提出了建议。

2、第一届“马克思、黑格尔与黑格尔派实践哲学”青年论坛

2023 年 5 月 27-28 日，第一届“马克思、黑格尔与黑格尔派实践哲学”青年论坛在中山大学锡昌堂举行，论坛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简称“马哲所”）和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

5 月 27 日上午，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王兴赛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马哲所副所长马天俊教授致辞。马天俊教授回顾了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史和研究特色，强调处于哲学和实践之间的实践哲学所具有的优长、担当和张力，黑格尔、马克思以及黑格尔派正是在这种张力下展开思想的事业。对这些思想的研究折射着我们自身的处境、思考和诉求，是漫长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环节或部分。

第一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徐长福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韩立新教授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在 1842-1845 年期间掀起了一场以“观念的异化”来反抗“思想的统治”的思想运动，即认为“观念的异化”是“思想的统治”的产生原因。青年黑格尔派致力于扬弃“观念的异化”，将异化出去的观念和本质归结于人的观念（世俗基础 I），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进一步把思想和观念归结为现实世界，即物质世界和物质生活本身（世俗基础 II）。

马天俊教授回顾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实践”以及维也纳体系前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实践”。《法哲学原理》出版于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黑格尔特别强调了哲学的思辨性或后思性，不免与现实有所妥协。随后马天俊教授分析了拿破仑战争所催生的普鲁士改革所带来的另一种“实践”，即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腐烂之后重新寻找出路，施特劳斯、费尔巴哈、施蒂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式尝试应运而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朱学平教授一方面结合《论犹太人问题》分析了马克思对法国《人权宣言》中人权概念的批判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另一方面通过表格展示了法国《人权宣言》中关于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权利的具体规定，并结合国内外学者耶利内克、布特米、张奚若、林·亨特等人的争论与研究，对法国《人权宣言》中人权的含义与由来进行了初步阐述，指明法国《人权宣言》中人权概念的含义与马克思对它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第二场报告由韩立新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田毅松副教授梳理了感性直观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论地位及其嬗变，分析了马克思对感性直观的批判及其超越。四川大学哲学系余玥教授对《法哲学原理》的“序言”进行了解读，尤其重点评析了黑格尔对天真心灵、内心真理说的批判以及黑格尔关于现实与理性和解关系的讨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东辉教授呈现了《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劳动思想的多维面向，尤其讨论了苦恼意识中的劳动问题、劳动对交往的作用以及宗教中的精神劳动等。

第三场报告由《学术研究》杂志社罗苹副主编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副教授指出，只有在洞悉了普遍贫困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根源及其所包含的结构不正义，并转向对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批判之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遭遇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答。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钊教授重新检视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并指出马克思攻击的是施蒂纳未曾思考、也并不在意的前提。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马军海副教授指出，马克思揭示了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历史性、主体性，重构了思维与现实的张力，确立了理解现实的辩证方法与实践原则。

5 月 27 日下午，第四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谭群玉教授主持。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万东副教授将马克思作为探讨幻象问题的重要代表，并分别考察了青年马克思对宗教、国家和哲学的幻象和真的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梁燕晓讲师指出，黑格尔的君权事实上是一种“立宪虚君”，这也为解决关于“两个黑格尔”的争论提供了新契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彬彬副教授首先分析了鲍威尔对有局限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并继而考察了马克思对鲍威尔实践和理论同一观的批判及其意义。

第五场报告由《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颜冲副编审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黄涛副教授以“从哲学的思辨到实践”为线索，分五个部分详细评析了《<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文本，考察了马克思如何致力于寻找实现人类普遍解放的方式。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陈士聪副教授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立场的不断变化出发，探讨了其对市民社会概念界定的内在发展逻辑，强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经历了一个从伦理实践逻辑、政治实践逻辑到社会实践逻辑的不断发展。

第六场报告由王兴赛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博讲师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和“类”的危机出发，强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了“对象性活动—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机制，从而提出了超越费尔巴哈的类哲学的新方案。南开大学哲学院夏钊助理研究员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提出了新的解释，强调费尔巴哈走向的是人的自然所塑造的可改善的自然，一种不同于仅仅面向单纯历史和单一个体的哲学人类学。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张子骞博士后根据黑格尔式理性主义内核对埃德加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重构，并指出埃德加如何揭示了政治国家的神学根源。

第七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覃万历副研究员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阳讲师从“黑格尔主义的感觉、思维与意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感觉、实践理智与理论理智”“光的比喻”等方面分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王兴赛副教授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区分，然后进一步从这种区分思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真理观。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叶甲斌博士后分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式“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批判，并指出了马克思思维逻辑的若干特征。

5 月 28 日上午，第八场报告由余玥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逸超副研究员强调，黑格尔逻辑学开端范畴的规定和意义建基于“概念”或“绝对理念”的“自身规定活动”这个黑格尔逻辑范畴绝对中心及其演进进程的根本动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冯嘉荟助理研究员分析了黑格尔早期在什么意义上受到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并赞同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学说，而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国家理论则将现代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个体交互承认的规范性空间之上。暨南大学法学院汤沛丰讲师指出，黑格尔的惩罚理论具有三重面向，现代社会既需要对政治与宗教的差异保持清醒认识，也必需探索如何将这种宗教所推崇的精神性巧妙地转化为政治制度设置以及相应的惩罚制度。

第九场报告由马万东副教授主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罗久副

教授强调，《伦理体系》是黑格尔客观观念论实践哲学第一次完整的体系性表达，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并成为了后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洪凯源博士后试图从第二自然这一视角出发来还原黑格尔对人与现实性关系的思考，详细分析了黑格尔的伦理性概念构建的思想史背景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谢晓川助理研究员说明了黑格尔为何会有意“无视”未来而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概念，并进一步展现了黑格尔派哲学内部面对缺失未来维度的世界历史概念所曾做过的两种解决方案。

第十场报告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黄钰洲讲师强调，黑格尔派中的卡罗维以一种双向的社会有机性批判圣西门派的观点，甘斯则从贫困的不可避免中捍卫了市民社会的偶然性，坚持了自由的回旋空间。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凌菲霞副研究员指出，法国吕贝尔、科尔纽和列斐伏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分别代表了对卢卡奇实践辩证法的拒绝、部分接受和修正式接受的观点。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陈杨助理教授认为，霍耐特在接受黑格尔关于社会实体的理论框架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革命理论的内容，使得其承认理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关于社会斗争的批判理论。

闭幕式由张子骞博士后主持，王兴赛副教授对各位学者的精彩报告和热烈讨论作了简要总结，向前辈学者们提携后进表示敬意和感恩，并感谢全体与会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各位同事的支持和参与，感谢会务团队的帮助。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3、第一届“马伦研究动态”工作坊暨第二届伦理学青年学术论坛

2023 年 6 月 17-18 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广东伦理学学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一届“马伦研究动态”工作坊暨第二届伦理学青年学术论坛在中山大学锡昌堂隆重召开（以下简称“工作坊”和“青年论坛”）。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马天俊教授主持。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首席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李萍教授分

别致辞。他们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伦理学术角度介绍了本次工作坊和青年论坛的意义和价值。

工作坊以马克思思想的“规范性”面向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重点关注马克思思想的“道德论”和“非道德论”解读及其背后的规范性议题，并从“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客观性问题”“马克思批判思想中的规范性定位”“马克思思想中的伦理学及元伦理学要素”三个主题展开。青年论坛以“马克思主义与规范性”“马克思主义与（元）伦理学”为主题展开讨论。

（一）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客观性问题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道德客观性——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初始问题和前置问题看”。他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当代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其次，针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否能够解决道德客观性的问题，学界需要将视线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本身的知识合法性问题”。最后人们只有认清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在何种条件下会被扭曲，才能有效回应道德客观性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卢俊豪的报告题目为“马克思双重批判视角下的道德客观性问题”。他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焦点应从“马克思有否伦理学内容”的诠释性议题转向“马克思能否解决现代道德哲学问题”的辩护性议题，由此回归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内核，表明西方哲学中绝对客观性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他强调，只有植根于既定社会现实的实践客观性，才是解决道德客观性问题的关键。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乔见教授对上述报告进行述评。他从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角度介入道德客观性问题。他认为，一是先秦时期文献中已存在对道德客观性问题讨论。二是无论马克思主义或儒家伦理，该问题均具有普适性。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陈真教授作第一阶段发言总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元伦理学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新：一是回应前置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规范性问题如何可能；二是给出马克思视角下道德规范的本体论方案和道德真理的语义学方案。

（二）马克思批判思想中的规范性定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霄教授作题为“马克思理解‘事实－价值’关系的辩

证法:一个早期视角”的报告。他认为，一是“事实－价值”关系的对立问题可引入早期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视角处理，二是马克思借助黑格尔辩证法，从现实本身去寻求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辩证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一致的。三是辩证法的初步形成经历了“理论的人道主义”和 “实践的人道主义”两个环节，二者对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性理论至关重要。

厦门大学哲学系杨松教授在题为 “阶级利益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念”的报告中，从“描述性”和“规范性”视角出发，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道德”的含义，又借助“阶级利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何以可能。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文贤庆教授作评议。他首先对张霄、杨松两位教授的论证进行元伦理学重构，针对张霄教授，他认为关于辩证法的动力维度需澄清其和德国古典哲学观点的异同；针对杨松教授，他认为关于历史必然性概念需澄清其与道德外在论的区别。

厦门大学哲学系徐梦秋教授作总结。他认为本轮报告揭示事实-规范框架下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定位：一是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二是说明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对规范性的理解存在差异；三是事实与价值间的冲突应通过社会历史实践予以解决。

（三）马克思思想中的伦理学及元伦理学要素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曲红梅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道德意识形态论题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她先是介绍了断裂论、融贯论和成熟论三种理解“道德意识形态”论题基本路径，然后针对三种路径予以反驳，认为其均未能回应“道德意识形态”论题，最后她认为道德被判定为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并不抵触，反而是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生成性和开放性。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志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建构马克思伦理学的几种尝试”。她分别考察四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方案：道德实在论、道德相对主义、功利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她认为，以外接的方式建构马克思伦理学的做法，存在曲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风险。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范志军教授在题目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点——从元伦理学视角看” 的报告中指出，一、过去以规范伦理学视角看待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往往会陷入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的选择悖论；二、从元伦理学的视角可将道德视为“意识形态”的表达，继而摆脱理论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犇群老师对上述报告进行述评。他描绘了当前元伦理学的学科地图，按理论阵营划分，他认为范志军教授方案存在将马克思伦理学解释为错误论的可能。

中山大学哲学系郝亿春教授作阶段发言总结。他表示，首先马克思关注的是追求生存价值的现实的、发展变化着的人；其次追求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可被视为一种“原初伦理学”，应视为容纳不同主张的元伦理学高阶理论。

（四）马克思主义与规范性

青年论坛第一阶段的报告人是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林建武，他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的道德哲学为什么依然需要一种规范性”。他认为，马克思的道德哲学应被表述为一种混合的道德实在论，道德实在论应构建于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凌在题为“道德舆论的规范性探析：从心理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报告中，认为借助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可将道德舆论的规范性建立在交往理性对共同利益的共识基础之上。

《道德与文明》编辑贾谋报告的题目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会出现道德规范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对规范性概念的理解，受到英国古典经济学“重描述轻规范”的传统影响。

国际关系学院王也作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要素及其定位”的报告，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要素为道德规范提供“绝对预设”，为规范性问题提供探索空间。

（五）马克思主义与（元）伦理学

青年论坛第二阶段的报告人是厦门大学哲学系韦庭学，他围绕“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完善论的关系辨析”问题，澄清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和完善论的关系，论述了个体偏好与异化批评学说关系。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家祥在题为“马克思的道德观内涵了何种本质主义”的报告中，认为从青年到晚期马克思的道德观背后是古典本质主义向本质主义批判的转变。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东华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元伦理学如何可能？一条道德建构主义的路径”，他认为马克思的元伦理学立场可采取道德构建主义的方式进行重构。

清华大学哲学系谢廷玉报告的题目是“麦金太尔与自然主义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元伦理学”，他分析了麦金太尔早期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元伦理学的探索方案，并认为该方案可基于雷尔顿自然主义框架进一步扩展。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

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座谈会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李萍教授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22&ZD032）”于2022年12月正式立项。课题组于2023年6月27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515会议室召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开题报告会。会议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哲所具体承办。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马天俊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处何婉冰副处长首先代表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处致辞。何处长向李萍教授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表示祝贺，并就该项目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了阐发，表示文科处作为学校科研管理服务部门将为课题组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做好项目全流程的管理工作，全力保证该项目的推进。何处长再次感谢哲学系、马哲所以及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期待该项目顺利推进并产出丰硕成果！

接下来，课题负责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李萍教授从核心问题、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内容、子课题结构五个方面向各位专家介绍课题论证的整体思路。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系统化理论建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依据；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践基础；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新时代本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新文明价值。课题共由四个子课题构成，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系统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初步探索、系统化建构、体系化确立以及新文明意义。

在专家评议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韩震教授非常认可课题组前期做的研究路线图，并对该课题的一些理解和建议做了细致阐发。韩震教授强调，要深入研究“新形态”的两个方面，即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特征和理论形态。过去的人面对的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而现在的人面对的更多的是人造的世界，包括人工智能和航天等。我们要建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具有世界的普遍意义，就是要把这个时代应有的理论形态表达出来。二十大报告中新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六个坚持可以融会贯通，我们要把它的理论形态刻画出来。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国家创新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这个主题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中国哲学研究来讲都非常重要，具有纲领性地位。项目论证做得非常好，非常缜密和周到。吴晓明教授指出，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需要扩展一些部分，尤其是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该课题在历史的逻辑上比较侧重于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实际相结合，而且还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深入研究新时代的本质特征，也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和中国发展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我们可以把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抓手。总书记讲第二个结合的结果就是互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侯才教授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这一选题意义非常重大，总体研究思路非常清晰。该课题的最大特色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样一种高度和层面上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它学术化、体系化。侯才教授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同一性，也要深入研究二者的差别。第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规定，这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价值观，应该是一个系统：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是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历史的一种合理的价

值理念。第四，我们要从构建现代国家模式的高度来认识五位一体。

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首先指出，该课题的主题是明确的，四个子课题的体系比较合理，线索也比较清楚，内容也比较充实和完整，体现了纯理论的探讨，也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丰子义教授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课题研究的目标或重点要放在新形态的探讨和建构上，而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形成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上。第二，关于新形态和时代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对时代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既要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时代，也要深入理解十八大以来所进入的新时代这个小时代，这两个时代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第三，关于新形态的理解和把握，新形态作为理论形态应该考虑几个因素，如应有明确的主题；应有与主题或总问题之间相关的论题或者重大问题；应有围绕各种论题展开分析形成的那些概念、命题、观点、理论；由各种理论观点形成的体系结构；跟理论体系结合在一起的研究的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委员、哲学部主任赵培杰研究员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新形态；一个是习近平哲学思想，或者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新形态，也是最新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习近平哲学思想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比较委婉的提法。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研究应该关注时代特征的变化以及世界的变化，还要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课题组应该吸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二级学科的一些学者。除了这些，课题研究也应该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一些比较重要的学科，吸收一部分学者参加讨论或者是部分章节的撰写。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杰出人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谢地坤教授指出，项目的设计、论证非常合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形态？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这些都是对中国学界的重大考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吸收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态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一定要把时代问题放在首位。研究新时代，我们切记不要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当代科学制度发展推

动着哲学研究。

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钟明华教授指出，该课题方案合理、可行，同时也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和新意。该课题既有的方案首先是描述性的，重过程，重历史。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新形态是历史的过程吗？有没有在四个新形态基础之上建构的整体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的反思性的、建构性的本质如何来显现？新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新”，可能有两种理解，一个是三位一体的新，一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新形态”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新形态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主题要新、范式要新、话语要新，只有具备了这些才可能构成“新”。因此，无论是三合一构成的新形态，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形态，我们都要认真思考它的主题、命题、范畴和体系。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澄清、完善和解决如下一些问题。第一，就题目本身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回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存在形态，是一种教科书体系形态；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所构成的。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态本身，还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第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体系建构，哪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第四，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要注意大形态和小形态的关系。我们最根本的还是要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问题。

专家评议阶段结束后，李萍教授进行了简要回应。她首先向几位评议专家表示感谢，这些建议都非常中肯、坦诚和宝贵，也非常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几位评议专家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开题前的讨论中也已有所考虑，并建立了与申报时不同的新思路。个别地方有比较大的调整，更细化，有一些是角度上的调整，包括布局等。李萍教授还就课题中的一些重点难点——比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历史实践与理论构造的关系、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等——与专家们作了进一步的沟通。今天各位评议专家给予的指导意见对接下来课题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推进该重大项目的顺利开展，课题组特别设立一个讲座系列，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发展论坛”，李萍教授邀请几位评议专家后面能

拨冗莅临论坛，继续给予指导。

开题环节结束后，课题组成员还就各位专家的建议以及接下来项目的具体开展进行了内部研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开题报告会圆满结束。

五、学术交流

2023 年 4 月 1 日，李萍教授受邀到桂林参加由中国伦理学会、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广西伦理学会、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伦理学大会暨《道德与文明》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

2023 年 4 月 4 日，王兴赛副研究员、凌菲霞副研究员和叶甲斌博士后参加第 73 届政治学研究学会国际会议（73rd PSA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23）。凌菲霞的报告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代西方和中国学术界的对话”（Marxism and China as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A Contemporary Dialogue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Academia），叶甲斌的报告题目为“不稳定无产者与政治激进主义：从北方到南方反思平等主义的理论和实践”（Precariat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galitarianism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王兴赛的报告题目为“1920-1930 年间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以张君劢的早期探索为例”（A Study of Democratic Socialist Thought in China among 1920-1930: Taking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Zhang Junmai as an Example）。

2023 年 4 月 8-9 日，王兴赛副研究员参加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和中山大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办的“德性与自由”系列学术论坛，论坛主题为“历史与自由：现代性的历史维度”，并参与评论了报告。

2023 年 4 月 9 日，陈长安讲师受邀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暨纪念黄枏森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题目是“发扬黄枏森先生精神，发展中国式辩证唯物主义”。

2023 年 4 月 13 日，吴重庆教授主持“经典与解释”第 28 期，主讲人是华东师

范大学高瑞泉教授，与谈人是陈立胜教授，讲座题目是“释‘观念’”。

2023 年 4 月 13 日，马天俊教授参加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办的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座第 2479 期，讲座主题为“康德与牛顿的时空观——从上帝到人类的思辨”。该讲座。

2023 年 4 月 15-16 日，徐长福教授、马天俊教授、王兴赛副研究员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主办的“第四届实践哲学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实践哲学的古今之变”。徐长福的发言题目是“实践的古今之变与实践哲学的古今之变——以斯宾诺莎为例”，马天俊的发言题目是“实践哲学的修辞学：论伽达默尔”，王兴赛的的报告题目为“古今视域下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主奴思想比较”。

2023 年 4 月 15 日，吴重庆教授应邀参加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中共潜山市委、潜山市人民政府、吾土乡村振兴工作站（潜山站）、中北规划设计（潜山）乡村振兴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四届传统村落保护暨乡村振兴——北京·潜山两地论坛”，并参与“规划和社会学引领的乡村建设运动”主题沙龙的讨论发言。

2023 年 4 月 25 日，李萍教授应邀参加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牧野讲堂·博雅论坛”做学术讲座，讲座题目是“新世界文明秩序建构的价值基点与伦理原则”。

2023 年 4 月 27-30 日，谭群玉教授参加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等主办的“二十大报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学术研讨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 2023 年年会暨第十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会议在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召开。谭群玉担任一个场次的分会场主持，并宣读了论文“论马克思新唯物论之‘新’”。

2023 年 4 月 28 日，张伟教授参加“图像·语言与当代艺术”跨学科研讨第 15 期“观物与观美”。

2023 年 4 月 27 日，徐俊忠教授应邀到云南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做学术讲座，讲座题目是“人民民主：何以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新形态”。

2023 年 4 月 28-29 日，徐俊忠教授、马天俊教授、陈长安讲师应邀到云南师范大学参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学术研讨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 2023 年年会暨第十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陈长安的发言题目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与中国大学的 MEGA 使命”。

2023 年 5 月 12 日， 徐长福教授应邀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师生做学术讲座，讲座主题为“黑格尔哲学对于斯宾诺莎哲学的进与退”。讲座主持人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清华教授， 与谈人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李怀涛教授、谭笑副教授、李元副教授和袁程副教授。

2023 年 5 月 12-14 日，徐长福教授、王兴赛副教授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人大德国古典哲学高端论坛”，论坛主题为“理性与自由”。徐长福的报告题目是“黑格尔哲学对于斯宾诺莎哲学的进与退”，王兴赛的报告题目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视角看理论的真理与实践的真理”。

2023 年 5 月 12-14 日，马天俊教授应邀参加“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会 2023 年年会暨第三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30 人论坛”并发言，会议主办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2023 年 5 月 13 日，吴重庆教授应邀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理解中国乡村系列讲座”，讲座题目是“焕发内生力量——‘隙地’乡村振兴的逻辑”。

2023 年 5 月 16 日，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应邀做中山大学哲学系“谦之名家讲坛”第 104 期，讲座题目是“诠释学的历史性与儒家经典起源”，吴重庆教授担任讲

座主持人。

2023 年 5 与 19 日，徐俊忠教授应邀到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做学术讲座，讲座题目是：“人民民主：何以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新形态”。

2023 年 5 月 19 日，吴重庆教授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萃英学院邀请，做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时间项目“交差统合视域下哲学的专业改造与提升系列讲座，讲座题目是“‘何处云山是我家’——珠江三角洲民间信仰场所的地理空间分布”，主持人是兰州大学陈声柏教授，与谈人是兰州大学刘宏涛副教授。

2023 年 5 月 20 日，吴重庆教授应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萃英学院邀请，做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时间项目“交差统合视域下哲学的专业改造与提升系列讲座，讲座题目是“‘隙地’‘狭地’‘边地’认识中国农村”，主持人是兰州大学台文泽教授，与谈人是兰州大学钟耀林副教授。

2023 年 5 月 20 日，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徐俊忠教授出席会议。

2023 年 5 月 20-21 日，张伟教授、王兴赛副教授、张米兰助理教授、叶甲斌博士后参加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伦理学与法哲学工作坊”第 1 期“政治与社会观念史”编辑工作会议。

2023 年 5 月 26 日，吴重庆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 2022 级研究生“哲学前沿”课程第 14 讲，讲座题目是“中国历史中的‘隙地’”，主持人是刘伟副教授。

2023 年 5 月 27-28 日，户晓坤教授、张米兰助理教授参加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等主办的“社会学视野中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论坛”，户晓坤的发言题目是“地缘政治视域中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研究”，张米兰的发言题目是“知识分子与文化权力”。

2023 年 5 月 27-28 日，张伟教授参加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现象学与中华古

学的当代生命——《张祥龙文集》研讨会暨张祥龙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致辞。

2023 年 6 月 1 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策划的“实践哲学圆桌会”第一期在北京大学举行，议题为“如何认识变局”，徐长福教授参会。

2023 年 6 月 2 日，徐长福教授应邀做北京大学哲学系第 93 次马哲论坛，讲座题目是“唯物史地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三个世界理论”，讲座的主持人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张梧助理教授。

2023 年 6 月 2 日，张伟教授应邀做河南大学公共与管理学院冯友兰讲座，讲座题目是“历史的事实与历史的先天：从胡塞尔致列维 • 布留尔的信谈起”。

2023 年 6 月 3 日，应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简称“BIEN”）邀请， 叶甲斌博士后参加了由基本收入全球网络和合肥清书馆联合主办的基本收入沙龙。 该沙龙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参与者包括境内外有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生。 叶甲斌担任本次沙龙的特邀嘉宾，为相关主题的研讨提供学术指导。

2023 年 6 月 3-4 日，马天俊教授、徐长福教授、凌菲霞副研究员、张子骞博士后应邀参加“第六界黑格尔和马克思研讨会——实践哲学的多维阐释路径”，主办方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中心。徐长福的发言题目是“马克思的总体性实践的能动结构”，马天俊的发言题目是“‘唯物’辩证法如何可能？——谈马克思与黑格尔”，张子骞的发言题目是“‘真正的实践是理论’——一种对埃德加政治哲学的渊源式考察”，凌菲霞的发言题目是“1950-1970 年法国马克思思想传记对卢卡奇实践辩证法的认识和接受：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必要性”。

2023 年 6 月 5 日，吴重庆教授参加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组织的“第十九期‘理解中国’读书沙龙：儒法、战争与中国经验——读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并做总结。

2023 年 6 月 9 日，张伟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 2022 级研究生“哲学前沿”课程，讲座主题是“‘乌合之众’是如何‘乌合’的？”。

2023 年 6 月 10 日，张米兰助理教授参加由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五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发言题目是“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主持人是郑辟瑞教授。

2023 年 6 月 12 日，凌菲霞副研究员参加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分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版系列研讨会”2023 年第 1 讲，报告人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主讲题目为“MEGA2 之后马克思的新形象”。该讲座在线上举行，凌菲霞担任本次讲座的学术翻译。

2023 年 6 月 16-18 日，陈长安讲师应邀参加由山东财经大学主办的“‘两个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跟踪”学术研讨会，发言题目是“亢慕义斋：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结合’的源头活水”。

2023 年 6 月 17 日，徐俊忠教授应邀参加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三峡大学等主办的“中共二十大的国际影响力暨第六届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圆桌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2023 年 6 月 17-18 日，张伟、户晓坤教授参加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承办的“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俄罗斯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九届全国俄罗斯哲学年。张伟代表承办方致辞，户晓坤主持第四场主题报告，并在第七场主题报告中做关于立足俄罗斯民族意识哲学反思的报告。

2023 年 6 月 23 日，谭群玉教授参加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 2023 年高层论坛，论坛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唯物史观”，并做题为“马克思的现代化

理论及其价值依据”的大会发言。

2023 年 6 月 28 日，谭群玉教授参加由天津大学、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联合主办，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历史唯物主义高端论坛”。

2023 年 6 月 30 日，李萍教授应广东工学院设计学院邀请为师生做专题报告，报告题目是“文化、文明与世界秩序重建的价值逻辑”。

六、获奖

2023 年 5 月 27 日，由吴重庆教授、王路老师指导，文一坤、王佳鸿、冯泳婷、时鑫豪四位同学参赛的项目《追寻内生力量——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小作坊的突围之路》，荣获第十七届“挑战杯·王老吉”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简介】：“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科协、省学联联合主办，是广东省参与人数最多、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六届。第十七届“挑战杯·王老吉”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共有 156 所高校、2029 件作品参赛，省校两级参赛人数超 17 万人。最终，广东省 135 所高校的 808 件作品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参加终审决赛。

2023 年 6 月 28 日，根据《中山大学关于表彰 2023 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中大学生[2023]16 号），马哲所博士生杨思敏、林展翰，硕士生战伟龙被评为中山大学 2023 届优秀毕业生。

2023 年 6 月 30 日，按《中山大学 2023 年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公示》的结果，李萍教授获得中山大学 2023 年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23 年 6 月 29 日，张东丹获得 2023 年中山大学哲学系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七、社会服务

2023 年 4 月 21 日，徐俊忠教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社教中心专访，讲述中山大学校史馆。

2023 年 4 月 21 日，微信公众号“中大人文社科”发表推文“徐俊忠：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

2023 年 4 月 27 日，吴重庆教授应邀参观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沙院区，并结合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了题为“大兴调查研究，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辅导报告。

2023 年 5 月 3 日，新京报社微信公众号“政事儿”发表推文“学者吴重庆：以获取真实信息为目标，调查研究就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截止至 9 月 1 日推文阅读量 3.6 万。

2023 年 5 月 20 日，李萍教授参加由中山大学校友会组织的“‘爱在初夏’校友音乐会暨新婚校友祝福活动”。

2023 年 5 月 21 日，李萍教授应邀参加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办的“关注青少年脊柱，健康科普公益行”——中山三院脊柱侧弯中心成立三周年暨新苗公益十三周年患友会活动，并做开幕致辞。

2023 年 5 月 21 日，李萍教授参加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深圳系友会组织的哲学公益大讲堂，讲座题目是“我的人生之路——燃点生命智慧，开启圆满人生”。

2023 年 5 月 23 日，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中山大学校长高松率队赴云南省澄江市考察，实地调研了中山大学办学纪念馆层青阁、中山大学西迁澄江办学永久纪念物选址、中大援建的玉溪市中山医院等地。徐俊忠教授陪同调研。

2023 年 5 月 24 日，吴重庆教授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的直播，主题是“淄博烧烤火爆的背后：地方社会活力的迸发”，担任主讲人，主讲人还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何慧丽教授。

2023 年 6 月 2 日，博士生杨思敏、林展瀚、龚城，硕士生姜震参加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共学党的二十大精神-哲学系学生党支部对谈系列活动”的第一场、第三场，吴重庆教授参与点评和指导。

2023 年 6 月 9 日，张伟教授、吴重庆教授，博士生杨思敏、龚城、严哲、周瑞婷、饶琳，硕士生战伟龙、张鹏博参加中山大学哲学系举行的“实践育人——哲学系参与乡村振兴与实践人才培育研讨会”，战伟龙报告题目是“在项目中发现科研能力——如何发现真问题”，龚城报告题目是“善用调查研究方法研究——从评估到研究的城乡集市调查”，杨思敏担任会议主持人，张伟和吴重庆做总结发言。

2023 年 6 月 10 日，李萍教授参加由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阅公益基金会、满天星公益主办，海珠区图书馆协办的 2023 年阅读马拉松，并发表总结讲话，分享她的阅读体验和对阅读的看法。

2023 年 6 月 15 日，徐俊忠教授应邀在广东省教育厅 2023 年度“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高职院校）骨干教师培训班上作专题报告，报告题目为“人民民主何以是人类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新形态”。

2023 年 6 月 27 日，吴重庆教授参加由中山大学附属一院主办的“当医学与人文在南沙相遇——医学人文研讨会暨项目启动会”，并参与发言和参观。

2023 年 6 月 26-27 日，张伟教授、吴重庆教授参加由中山大学首届人文社科跨学科工作坊，工作坊主题是“跨学科：观点、案例与经验”。张伟教授主持会议，吴重庆教授介绍综合性学术杂志的办刊经验。

2023 年 6 月 28 日，徐俊忠教授参加中山大学哲学系 2023 届学生毕业典礼，并发表毕业寄语。

2023 年 6 月 28 日，李萍教授应邀参加由中共广州市委老干部局指导，广州国际生物岛（中以合作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广州市越为银发活力研究院（银发智库）主办的首届银发智库专家交流会，本次交流会主题是“建高端银发智库·聚四海银发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并做大会发言。

八、项目管理

（一）立项

2023 年 5 月 29 日，按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办公室通知，谭群玉老师申报的“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史事年编”，获得 2023 年文化传承创新重点发展项目立项，项目周期 3 年，立项金额 20 万元。

2023 年 5 月 30 日，连州市保安镇人民政府委托项目“保安镇镇域乡村振兴规划（2021-2035）和驻镇帮镇扶村五年帮扶规划（2021-2025 年）编制”立项，项目负责人是吴重庆教授，项目经费 50 万。

（二）结项

2023 年 5 月 4 日，广州市农业局项目“广州市农业局广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第三方评估项目”（立项编号 1811138）结项，项目负责人是吴重庆教授。

九、人才培养

2023 年 6 月，马哲所毕业的硕士生 13 人，分别是刘瑞、朱晨飞、夏雪彦、杨文磊、张芷茵、梁泽方、裴冰瑶、林夏、代文勃、左颜春、杨奇政、赵婷婷、战伟龙。

2023 年 6 月，马哲所毕业的博士生 4 人，分别是荣伟杰、杨思敏、林展翰、黄欢。

十、其他

2023 年 4 月 23 日，由环球网时尚频道发起的世界读书日好书推荐线上活动正式启动，由九位大咖学者推荐不同领域、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书籍，希望借此活动的发起令更多人的多读书、读好书。吴重庆教授作为推荐官之一，推荐书籍是《超越空心化》，推荐理由是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

2023 年 5 月 1 日，教育部公示了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张伟教授担任课程负责人的“现象学经典导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系列）”课程，入选线下一流课程。

2023 年 5 月 5 日，王兴赛副研究员转聘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23 年 5 月 9 日，吴重庆教授担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23 年 5 月 27 日，李萍、徐俊忠教授参加中山大学哲学系七七级系友毕业 40 周年相聚活动。

2023 年 6 月 8 日，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研究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最新发布校友会 2023 中国高贡献学者榜单，全国高校共 6917 名杰出学者上榜，李萍教授入选。

2023 年 6 月 15 日，吴重庆教授担任中山大学第八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